

安全、策略与秩序

2022年3月

墨西哥境内与中国有关的野生动物偷猎和 贩运活动

Vanda Felbab-Brown

目录

执行摘要	3
I. 引言	5
方法	6
II. 与中国相关或无关的墨西哥境内野生动物贩运	7
陆地物种	8
海洋物种	10
有组织犯罪集团接管墨西哥渔业	11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与中国贸易商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14
III. 洗钱和价值转移	17
IV. 中国与墨西哥在打击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外交和执法合作	18
对零售市场的阻截和打击	18
中国对与墨西哥有关的野生动物贩运的公众叙述	19
反洗钱工作	20
三边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努力	20
法律援助	21
V. “墨西哥应自行解决”：墨西哥的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与挑战	22
VI. 结论和建议	24
执法	24
打击偷猎的经济激励措施	25
关闭有问题的市场	26
保护保护者	26
作者简介	27
鸣谢	27
参考文献	

执行摘要

从墨西哥向中国贩运野生动物的问题很少受到国际关注，但这种现象正在增加，让本已受到为美国等其它市场偷猎影响的墨西哥生物多样性受到更大威胁。由于墨西哥犯罪集团往往控制着墨西哥的大片领土，这些区域成为政府官员和环保人士的禁区，因此，我们对墨西哥偷猎、非法伐木和野生动物贩运活动的了解有限。然而，偷猎和贩运的程度，包括贩运到中国的程度，可能比大部分人的想象中要严重。

墨西哥为中国市场非法获取的陆地和海洋物种以及木材，日益威胁到墨西哥的生物多样性。在墨西哥偷猎并走私到中国（有时经由美国）的物种有：爬行动物、海参、石首鱼、鲍鱼和鲨鱼，以及越来越多的美洲豹和各种红木。

从墨西哥到中国的合法野生动物贸易，如海参和鳄鱼皮，为偷猎动物行为提供了掩护。非法捕鱼在墨西哥的渔业生产中占比惊人，但即使是合法的捕鱼和出口业也提供了一个向中国输送非法渔获的途径。

野生动物的合法贸易也日益推动墨西哥犯罪集团的洗钱活动的发展，墨西哥犯罪集团利用各种野生动物产品作为价值转移机制，向中国贸易商换取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等非法毒品的前体化学品，然后在墨西哥使用这些前体生产毒品。事实上，在墨西哥，为中国市场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的行为与贩毒、洗钱和非法经济中的价值转移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它地区很少看到。然而，中国野生动物贸易商与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转变。

墨西哥各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特别是锡纳罗亚贩毒集团，试图垄断整个合法以及非法渔业的纵向供应链。他们不仅要求获得部分利润，还规定合法和非法渔民的捕鱼量，坚持要求渔民只向犯罪集团出售捕到的鱼，而且餐馆，包括那些为国际游客提供服务的餐馆，都只能通过犯罪集团购买鱼。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规定了对于贩毒集团的海洋产品渔民可以获得多少报酬以及餐馆应当如何定价。犯罪集团还强迫加工厂处理犯罪集团带来的鱼。他们还敲诈勒索海鲜出口商。

墨西哥犯罪集团对渔业的接管使中国贸易商进一步与犯罪集团直接接触，并改变了两者的关系模式。十五年前，中国经营合法及非法野生动物产品的贸易商直接与当地猎人、偷猎者和渔民打交道。而现在，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强行介入，成为中间人，规定生产者必须向他们出售，而他们自己则将产品卖给从墨西哥边境运到中国的中国贸易商和贩运者。

从另一个角度讲，与非法采伐一样，中国贸易商对某种动物或植物物种感兴趣，并努力在墨西哥为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采购，这引起了墨西哥犯罪团伙的注意。

中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承认中国对墨西哥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负有责任，并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应由墨西哥政府来解决。预防和执法合作很少，而且是零星的。中国政府对开展官方性质的中墨或中墨美打击野生动物贩运合作并不感兴趣，而是更倾向于开展非正式的个案合作。

尽管如此，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除了扣押从墨西哥走私到中国的石首鱼鱼鳔外，还在2018年对零售市场进行了几次拦截突击检查。公开可见的公然销售非法野生动物商品行为因这些突击行动而消失。售卖被搬到了私人在线平台，不再公开进行。但中国似乎没有继续努力打击现在更隐蔽的非法销售，也没有对秘密销售进行突击搜查。

尽管墨西哥的自然资源正日益受到有组织犯罪和野生动物贩运者的威胁，但是由于现任墨西哥政府采取的行动，墨西哥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执法机构变得越来越无力。墨西哥环保机构缺乏预防和制止环境犯罪的强制力、人员和设备。墨西哥的政府官员、野生动物商品的合法贸易商，甚至执法机构都被有组织犯罪系统性地腐蚀和恐吓，恶劣的法治环境为偷猎、非法伐木和向中国贩运野生动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要防止非法采伐和偷猎以及野生动物和木材贩运对墨西哥生物多样性造成更大的损害，迫切需要墨西哥的关注，投入更多的专属资源，也需要开展有意义的国际合作，找到并捣毁走私网络和零售市场。

I.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野生动物贸易和贩运中的参与和作用根深蒂固，范围广泛，且往往具有破坏性。¹中国在墨西哥的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所起作用较小，且鲜为人知，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亚马逊地区与中国有关的野生动物贩运。

与美洲和全球其它地方一样，墨西哥得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活动并非全都与中国有关。但是，中国对墨西哥野生生物产品的需求在增长，无论是合法捕猎还是从野外偷猎，并更加多样化，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产生严重影响。

此外，在监管环境和执法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与中国有关的墨西哥野生动物贩运活动正在扩大。在墨西哥，强大的犯罪集团拥有广泛且日益增长的领土、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正越来越多地进入自然资源的合法和非法经济领域，而法治仍然薄弱，政府也难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从墨西哥向中国市场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的现象日益与非法经济中的毒品贩运、洗钱和价值转移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墨西哥的中国野生动物贸易商为中国市场寻找越来越多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他们与墨西哥贩运群体和当地居民的关系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偷猎者和中国贸易商之间充当了中介。

即使中国政府基本不承认中国对墨西哥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负有责任，并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应由墨西哥政府来解决，一向无力的墨西哥环境保护和环境执法机构却正在变得更加脆弱。这些机构缺乏有效预防和制止环境犯罪所需的强制力、人员和设备。此外，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政府根据一项全面的行政令，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估和监督的例外条例，²并削减了所有环保机构的预算。与许多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一样，墨西哥的环保人士面临暴力恐吓：2012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3人被杀。³

在当地的受保护地区和非受保护地区，墨西哥环境官员的人数都非常少，加上墨西哥犯罪集团经常统治和控制墨西哥的大片领土，这些领土成为了政府官员和环保人士的禁区，⁴这也意味着对墨西哥偷猎、非法伐木和野生动物贩运的了解是困难的、有限的，也是受限制的。目前缺乏对环境犯罪调查的详细报告，也缺乏关于环境犯罪事件的系统数据库和关于偷猎的数据集。环保人士无畏的工作记录下了在米却肯州的帝王蝶保护区等地发生的植物和动物偷猎行为。⁵然而，发生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可能远比报道的多，特别是墨西哥犯罪集团接管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经济，如合法和非法捕鱼及伐木。⁶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贸易商和建筑公司在墨西哥的业务也日益多样化，墨西哥野生动物可能会面临的险恶的未来。

本文是布鲁金斯系列报告的一部分，这些报告探讨了中国、中国贩运者和消费者在毒品、人口贩运和自然资源等各种非法经济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内部反应和国际执法合作与外交。

本报告内容如下：首先纵观墨西哥与中国市场无关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模式，概述了与中国有关的墨西哥野生动物（包括陆地和海洋物种）的贩运情况。然后描述了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与中国贸易商之间的互动和两者关系的模式及变化。接下来，报告展示了野生动物贸易和贩运如何成为为非法毒品交易洗钱并进行价值转移的手段。之后，报告分析了中墨之间有关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的外交和叙事，以及中国在墨西哥执行环境法规中的作用。最后一节向墨西哥、中国和美国政府提供了详细建议，说明如何改进墨西哥的保护工作，以及如何打击从墨西哥到中国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建议包括：

- 执法措施，包括拦截和捣毁野生动物贩运网络，进行现场执法；
- 制定经济激励措施，鼓励社区不要偷猎；
- 关闭中国有问题的零售市场。

方法

⁷除了参考现有文献并借鉴笔者之前关于墨西哥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特别是关于从墨西哥贩运石首鱼到中国——的工作外，本报告主要是基于对美国和墨西哥外交官、政府和执法官员，墨西哥、中国和国际保护生物学家，墨西哥、中国和其它地方的民间社会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墨西哥偷猎者和贸易商的 73 次采访。笔者在墨西哥各地，包括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米却肯州和格雷罗州亲身进行了采访。对中国或墨西哥以外其它地方受访者的采访时通过线上加密平台进行的。进行所有采访时都考虑到中国政府可能采取报复行为（如政府公诉或拒发签证）或墨西哥犯罪集团可能诉诸暴力进行报复。在某些情况下，受访者受到了中国和墨西哥犯罪集团的人身安全威胁。因此，下文中的所有采访不仅都没有使用消息来源的姓名，而且有时还必须进一步模糊其位置，以及对对话者的其它身份信息。许多接受采访的中国公民认为，他们在与美国智囊团分析员接触之前必须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这使得采访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公民越来越害怕批评中国政府，而与仅仅十年前相比，外国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进入中国的机会以及有关中国执法问题的信息已经大幅减少。

笔者和她的研究团队还研究了数百篇中国和国际媒体的文章，以及中国政府官方对野生动物贩运的公众叙事和政策态度。

II. 与中国相关或无关的墨西哥境内野生动物贩运

在墨西哥，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活动在中国参与陆地和海洋物种偷猎之前就早已存在。墨西哥的国内偷猎市场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偷猎的对象包括当宠物养的狼蛛和家养的兰花，以及与人类产生冲突的动物，如美洲豹，人们认为美洲豹对饲养的牛产生了威胁。⁸在墨西哥，大部分的偷猎行为是为了满足墨西哥当地的需求，如在格雷罗州的阿卡普尔科、奇尔潘辛戈和奇拉帕等城市出售海龟肉和蛋、兰花和鸟类。⁹金刚鹦鹉、鸚鵡、蜂鸟和其它鸟类也从野外被掠走，以供应国内市场以及中美洲和美国的宠物贸易。它们的羽毛，就蜂鸟而言，被制成爱情保护符，在被偷猎的蜂鸟的干尸上包裹爱人的照片，以求爱情长久或破镜重圆。¹⁰墨西哥城的索诺拉市场公开销售濒危动植物物种，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大型野生动物市场上可以买到各种被盗猎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产品。尽管圣路易斯波托西野生动物市场可能是最大且最知名的市场，但这并不是唯一一个野生动物贸易（包括偷猎物种）随处可见、被当地社区接受、且被政府当局容忍的市场。

墨西哥是走私到美国的偷猎野生动物的重要来源国和转运国。除了金刚鹦鹉（美国仍然是墨西哥的金刚鹦鹉主要市场）之外，狼蛛、仙人掌（墨西哥拥有世界上种类最多的仙人掌）和爬行动物（活体或皮）也是被贩运到美国的主要物种。¹¹蜂鸟爱情护身符也被贩运到美国，在墨西哥裔社区中出售。

1997年，墨西哥政府为了向当地社区和私人土地所有者提供在其土地上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所有权方面的经济利益，¹²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管理单位（Unidades de Conservación y Manejo de Vida Silvestre，缩写UMA）制度。UMA制度将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法律控制权授予当地社区和私人业主。¹³

这种法律和经济管制尤其事关被列入墨西哥环境条例规定的任何保护类别物种，UMA 特许者可以在政府规定的配额内猎捕这些物种。因此，在如墨西哥南部和北部，出现了几个私人狩猎 UMA 特许区。当地社区得以通过野生动植物贸易——如兰花贸易——发展其地区。

拥有强大治理结构的社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润，并且在没有受到有组织犯罪威胁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这一制度来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但这些条件只是有时才会实现，特别是当地社区对野生动物的消费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无法产生较高的收入。在没有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下，墨西哥各地的生物多样性也都在减少。

在墨西哥的许多地方，包括墨西哥南部等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UMA 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灰色地带，出现无政府许可或超政府配额的非法捕猎活动，以及洗白偷猎动物的行为。例如，在墨西哥南部，UMA 的所有者一直在帮助美国猎人偷猎美洲豹。¹⁴

由于任何拥有土地的人，甚至是能够出示伪造的土地所有权文件的人，都可以被授予 UMA 许可，就连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可以购买或强行征用土地并宣布其为 UMA 特许区。任何这种可能被犯罪集团拥有的 UMA 特许区都可能成为不可持续采伐保护物种的重灾区，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野生动物市场。

然而，在墨西哥，对 UMA 的管理以及对是否遵守受保护物种的采伐配额的监督是非常薄弱的。首先，墨西哥没有“护林员”，即派驻在保护区的武装执法警卫，他们能够对偷猎者和野生动物贩运者采取行动。墨西哥国家自然保护区委员会（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Áreas Naturales Protegidas，缩写 CONANP）管理和监管保护区，但没有执法能力。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相比，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局（PROFEPA）是总检察长办公室负责环境保护的部门，其强制力非常有限。因此，墨西哥环境保护机构基本上只能将违法行为报告给另一个执法机关，如国防部（SEDENA）或海军部（SEMAR），让他们采取实地行动。如果执法机构确实采取行动，无论是逮捕偷猎者和野生动物贩运者，还是没收非法的野生动物产品，偷猎的危害往往都已经造成。

墨西哥渔业同样存在多种形式的违法行为，包括捕捞受保护物种、超额捕捞或捕捞尺寸不足的动物。¹⁵非法捕鱼占墨西哥鱼类生产的比例很大。¹⁶1950年至2010年，即使在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大举进入渔业并使墨西哥的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的捕鱼活动乱上加乱之前，墨西哥至少有一半的捕鱼量没有报告。¹⁷

长期以来，墨西哥周围的海域和海洋一直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地方，渔业监管充斥着腐败，执法能力几乎不存在。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缺乏人员和资源，船只数量也太少，无法巡逻墨西哥很长的海岸线，也无法监测来往渔船，包括10万多艘小型船只（称为“潘加”）和大型船只。墨西哥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倡一个基于权利的办法，给予社区在当地捕鱼的权利，同时引导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捕鱼，并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巡逻和保护，此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但成果也受到有组织犯罪集团和中国市场的威胁。¹⁸

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大，最多样化的野生动物需求地。¹⁹中国人有使用和消费野生动物的悠久传统，而且人民越来越富裕，他们购买各种用于中医的野生动物产品，中医认为动植物产品具有治疗和壮阳的功效（大多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他们还将野生动物产品作为古玩、装饰品、食品、宠物，用于服装，并作为一种经济投资和投机产品。²⁰

的确，为中国市场偷猎海洋和陆地物种的行为在墨西哥各地似乎越来越猖獗。

陆地物种

在²¹亚洲各地，老虎因皮肤、爪子、牙齿和骨头能装饰服装及用于中药而被偷猎。老虎的减少导致中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商在世界各地寻找其它大型猫科动物以满足中国的需求。在非洲，偷猎以及暂时合法的人工养殖的狮子和豹子成为这些部位的供应来源；2021年5月，南非禁止了此类出口，也禁止了狮子圈养场，认为该行业对野生狮子种群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²²中国的野生动物贩子还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圭亚那为中国市场组织了广泛的美洲豹偷猎活动。²³在墨西哥，大多数报复性和机会主义的美洲豹偷猎（尽管缺乏系统性数据）似乎也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市场相关联。在墨西哥南部——特别是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交界处——开展工作的墨西哥非政府环保组织，经常面临来自那里的墨西哥犯罪团伙的暴力威胁，他们发现越来越多没有爪子、牙齿和其它身体部位的美洲豹尸体，这表明这些偷猎产品是被运往中国用于中医的。²⁴

就在这些地区，如恰帕斯州和坎佩切州，2013年和2014年，中国中间商寻找受保护的假花梨木（*Schwartzia* 品种）和蔷薇木（*Dalbergia* 品种），从而推动了当地社区的非法采伐。由于长期参与毒品贩运、人口走私和偷猎，当地贫穷和边缘化的原住民社区很容易被中国人承诺的蔷薇木木材大笔资金所吸引。²⁵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扩大了在非法采伐方面的势力和作用。美洲豹的偷猎趋势似乎是建立在这些非法伐木网络之上的。²⁶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交界处的雨林，包括蒙特斯·阿祖勒斯和卡拉克穆尔生物圈保护区，随处可见用于贩运毒品的非法飞机跑道，这些跑道也可用于运输非法野生动物。在格雷罗州，中国中间商在那里寻找阔变豆木，他们也同样首先尝试找到供应，然后吸引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进入。现在，这些树木遭砍伐，并被运到米却肯州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港运往中国，与市政当局有关系的墨西哥犯罪集团获得了虚假的采伐许可证，然后卖给中国贸易商。²⁷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非法伐木和偷猎往往与中国合法企业对自然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存。中国交通建设公司（CCCC）隶属赢得玛雅列车铁路项目第一标段建设的企业集团之下。²⁸这条对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的铁路贯穿墨西哥一些最原始和生物最丰富的地区，那里有美洲豹、豹猫、金刚鹦鹉、鸚鵡、巨嘴鸟和许多其它可作为偷猎目标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²⁹这或使施工沿线偷猎活动大大增加，包括供给墨西哥中国侨民和中国市场的偷猎行为也会增加。然而，尽管多个环境评估警告说，生态成本很高，但墨西哥当局一直在推进这一项目。³⁰

与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中国的贩运者也在墨西哥寻找各类爬行动物，包括鳄鱼皮以及可食用或可作为宠物的乌龟。UMA 制度帮助在坎佩切州和塔巴斯科州建立了鳄鱼和短吻鳄养殖场，来繁殖这种爬行动物以获得鳄鱼皮。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其它地方，这种许可可通过农场这一合法来源来满足需求，因此极大地减少了偷猎。然而，在墨西哥，家庭式鳄鱼养殖场一直在复制亚洲野生动物养殖场普遍存在的野生动物偷猎洗白问题。³¹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这些养殖场以 40 美元左右的低价出售鳄鱼皮，且出售的鳄鱼皮和 c 数量远远超过了养殖许可所允许的或者超出了自己的养殖能力，它们的存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³²

各类动物，包括稀有的只能在墨西哥找到的爬行动物，已经在香港被查获或被环保非政府组织在香港市场上发现。其中包括恰帕斯州特有的红唇树鳄蜥（*Abronia lythrochila*）和哈利斯科州特有的瓦拉塔泥龟（*Kinosternon vogti*）。³³从外观上看，瓦拉塔泥龟和相似度很高的哈利斯科泥乌龟（*Kinosternon chimalhuaca*）很像中国特有、常被贩卖、数量骤减、现已濒临灭绝的金币龟（*Cuora trifasciata*），在大部分过去的活动区域已经看不到金币龟了。这些罕见的墨西哥特有物种出现在中国市场上表明，野生动物贩运者正在墨西哥寻找类似于中国市场非常需要但在其它来源地已灭绝的物种。

在墨西哥和中国的海洋物种野生动物贸易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他们寻找其它地方已灭绝物种的替代品，甚至只是表面上与另一种动物或植物的某些理想品质相似的物种，下文所述的墨西哥石首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在香港检获的其中一只动物是中国当局送往美国鉴定的青蛙。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尚未被科学命名的物种，³⁴这表明中国野生动物贩运者在墨西哥的活动范围可能很广。

海洋物种

中国在墨西哥海洋物种贩运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广泛，或起码更广为人知。出售给中国买家的不受管制或非法捕捞的海产品包括鱼翅、海参、龙虾、鲍鱼、虾、蛤蜊、³⁵ 牡蛎、海蜇和石首鱼鱼鳔。

加利福尼亚湾的石首鱼偷猎活动也许是国际上最臭名昭著的墨西哥非法捕捞案件。石首鱼的鱼鳔（西班牙语叫 *buche*）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美食特产，并被制成汤。墨西哥特有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Totoaba macdonaldi*）是一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黄花鱼，在墨西哥被禁止捕捞和出口。21 世纪初，当黄唇鱼（*Bahaba taipingensis*）——其鱼鳔在中国被制成花胶食用——在中国被捕捞完后，中国贸易商开始组织在墨西哥偷猎石首鱼。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石首鱼的鱼鳔和其它黄花鱼的鱼鳔一样，在中国也是一种投资和投机形式，较大的鱼鳔每公斤售价高达 60000 至 85000 美元。³⁶

渔民用非法捕获石首鱼的刺网也会缠住一种非常罕见的哺乳动物，小头鼠海豚，它一旦被网住很快就会被淹死。³⁷截至 2021 年冬季，科学家只找到了七、八头小头鼠海豚。³⁸虽然好消息是，这一数字包含了两头小头鼠海豚幼崽，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仍然暴跌了 99%，原因主要是中国市场偷猎石首鱼。³⁹用于偷猎石首鱼的刺网，以及用于捕捞出口到中国的虾的刺网，都会缠住小头鼠海豚，作为需要从空气中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小头鼠海豚在几分钟内就会窒息。⁴⁰

由于缺乏有效执法手段防止偷猎，腐败丛生，以及无法为偷猎者找到合法生计，墨西哥长达数十年的环境保护努力未能阻止偷猎石首鱼的现象。⁴¹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特别是锡纳罗亚贩毒集团，还有一些下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利佩和圣克拉拉的本地犯罪集团，几年前开始从事偷猎和贩运活动。⁴²如下所述，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现在在中国买家和当地石首鱼偷猎者（*totoabaeros*）的接洽中发挥了关键及主导作用。洛佩斯政府不愿意使用武力，特别是不愿针对想要偷猎石首鱼的愤怒渔民，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在陆地和海上进行有意义的执法。⁴³

然而，即使在洛佩斯当上总统之前，政府的执法力度也不够。墨西哥海军和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都无法执行石首鱼或其它刺网渔业法规，回购刺网或放弃捕鱼许可证的补偿计划也没有减少刺网偷猎。⁴⁴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对石首鱼偷猎者的执法实际上只是执法当局的烟雾弹。⁴⁵

为了制作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且价格昂贵的鱼翅汤，过度捕捞鲨鱼和偷猎受保护的鲨鱼物种已经使世界上许多鲨鱼物种灭绝。墨西哥目前也开始出现过度 and 非法捕捞鲨鱼的重大问题，如果是按价值而不是按数量来算的话，可能已经成为鱼翅出口大国。⁴⁶尽管割鳍，即从活的或死的鲨鱼身上割下鱼鳍并把尸体扔进海里，以及鱼翅出口在墨西哥是非法的，但非法出口到东亚的情况确实存在，墨西哥和香港当局经常查获墨西哥鲨鱼的鱼翅干。⁴⁷然而，执法部门的缉获量可能只占非法出口的一小部分。⁴⁸墨西哥当局对鲨鱼捕捞活动缺乏监测，使这一问题更加严峻。墨西哥当地消费鲨鱼肉，但墨西哥当局几乎不执行鲨鱼捕捞配额，过度捕捞使鲨鱼数量不可持续的现象可能已经出现。⁴⁹一些为墨西哥市场进行的捕捞活动也成为非法捕捞鲨鱼鳍的掩护，这些鲨鱼鳍并不在墨西哥消费，而是被贩运到中国。⁵⁰

即使是墨西哥政府批准的合法海洋捕捞，也常常是灾难性且不可持续的，以满足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侨民社区对特定物种的大量需求，其成员也参与了从墨西哥通过美国向中国贩运海参的活动。21世纪初在墨西哥政府的推动下，几种海参的商业捕捞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在尤卡坦和坎佩切河岸发展。⁵¹当时，中国中间商开始为中国市场组织捕捞，因为在中国，海参是一种价格昂贵、受人追捧的美味佳肴，传闻具有中医疗效。但是，监管管理和执法措施无法跟上，捕捞变成了一种疯狂的淘金行为，无视配额和季节性的禁捞。⁵²捕捞也引发了渔业社区、海上土匪和海盗间的暴力冲突⁵³，敌对的渔民群体试图窃取对方捕获的日益稀少的鱼类，本土居民也组织起了乡村自卫团体。⁵⁴那些负责过滤海洋中的有机垃圾的物种对生态极重要，但却因捕鱼而毁。坎佩切大浅滩的海参数量从2009年的20000吨降至2013年的1900吨，此后继续减少。⁵⁵2018年约有1000名海参偷猎者在坎佩切大浅滩区域活动，完全无视帮助物种恢复而实施的禁令。⁵⁶

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也有为中国市场或中国侨民社区合法和非法捕捞不同种类海参的现象。在加利福尼亚湾，非法捕捞海参的活动猖獗。⁵⁷一些物种已经严重枯竭，在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物种中，允许捕捞的量是非常少的。然而，超额违法捕捞和未经许可捕捞的情况持续发生。⁵⁸

在UMA制度下管理的海参养殖一方面可以满足亚洲的一些需求，但另一方面有一些墨西哥环境活动家担心，UMA水产养殖机制也可能被非法野生捕捞者利用，就像世界各地的特许设施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⁵⁹

有组织犯罪集团接管墨西哥渔业

此外，我在墨西哥对当地合法和非法渔民、海产品生产商和出口商、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的采访显示，即使是合法的渔业，即可以合法捕捞的海洋物种的渔业，也被墨西哥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系统性接管，特别是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在较小程度上哈利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CJNG）也是如此。在一些地方，开展活动的是较小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墨西哥的受访者往往最不愿意说出与他们打交道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叫什么，有时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有时他们害怕在采访中说出名字，往往只用“毒梟”或“大人物”这样的字眼。然而，那些愿意说出在渔业上打交道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名字的受访者都提到了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具体是哪个犯罪行集团也与地点有关。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在与一个分裂集团及其CJNG盟友的较量中基本胜出，并因此成为当地渔业的主要犯罪集团。相反，在下加利福尼亚州，例如在恩塞纳达-罗萨里多地区的大型渔场，两个贩毒集团及其当地盟友和附庸集团为敲诈竞技捕鱼业和向餐馆和酒店售鱼而相互竞争。⁶⁰墨西哥各地犯罪集团接管的程度不一，也没有形成完全接管的格局。

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下面描述的所有接管特征。在一些地方，大型和小型（即传统型或自给自足型）渔业的渔民和行业参与者可能只是支付敲诈费用。而在其他地方，他们被迫将自己捕到的鱼卖给犯罪集团，而犯罪集团决定了他们可以捕多少鱼，加工厂被迫加工犯罪集团带来的鱼，餐馆被迫只能从毒梟那里买鱼。

这种垄断既出现在高价的物种上，如鲍鱼、象拔蚌、龙虾、扇贝（如 *callo de hacha*）和石首鱼，贩毒集团将这些海产出售给中国以及美国市场和专门服务外国游客的墨西哥餐馆。这样的垄断也出现在价值较低的物种上，如较小的蛤蜊、海蟹（*jaiba*）家族的物种，以及在墨西哥销售的鳍鱼，如无鳔石首鱼、鲷鱼、星云副鲈（*verdillo*）和大洋茎方头鱼（*pierna*）。犯罪分子首先针对偷猎如石首鱼等受保护物种的渔民，然后转向勒索捕捞低价值海产品的小规模渔民，强加规则，最终迫使他们只卖给贩毒集团。那些捕捞高价值物种、特别是用于出口的大型公司虽然是犯罪分子最后才会针对的目标，但在墨西哥各地越来越受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施压。⁶¹

墨西哥犯罪集团对渔业的这一接管使中国贸易商直接与犯罪集团接触。而如果中国贸易商对某一动物或植物物种感兴趣，并尝试在墨西哥大规模采购，如非法砍伐的木材，供给中国市场，那这会吸引墨西哥犯罪集团的注意。反过来，这些集团试图渗透并接管中国贸易商感兴趣的商品经济，想要从与中国贸易中也获取一些利润。例如，在向中国出口象拔蚌上，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在大约 5 年前开始垄断从生产和加工到向中国中间商销售的整个供应链。贩毒集团买下了 CONAPESCA 发放的所有象拔蚌许可证，这些许可证数量很少，但允许捕捞规模很大，每个许可证 200 吨，贩毒集团再组织渔民捕捞象拔蚌，同时阻止别人捕捞。贩毒集团还组织了对象拔蚌的非法捕捞，然后通过拿到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发放的政府捕捞许可证的渔民洗白非法渔获。⁶²

过去的几年里，在西北部的锡纳罗亚、索诺拉、下加利福尼亚和南下加利福尼亚等州，有组织犯罪集团，特别是锡纳罗亚贩毒集团，试图在整个垂直供应链上垄断合法和非法渔业。在墨西哥湾一侧，塔毛利帕斯州和金塔纳罗奥州的渔业也受到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施压。⁶³

最初，他们向合法和非法渔民、渔民合作社以及海产品加工厂、运输商和出口商索取敲诈费。但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垄断渔业的所作所为不止于此。他们进入当地社区，要求社区将捕获的鱼卖给犯罪集团，否则就有可能被贩毒分子杀害。他们规定当地社区某种鱼可以捕多少以及要交给贩毒集团多少，如果做不到，社区或社区代表将受到惩罚。⁶⁴有时，他们故意把数量定得超过社区允许捕捞的数量，迫使当地渔民组织其它社区为毒枭捕捞，否则渔民将面临暴力报复，这实际上就是把垄断外包。⁶⁵他们在社区内派驻贩毒集团的监督员（*halcones*），以确保社区不向敌对的犯罪集团或独立购买者出售，并对违法者进行残酷惩罚。⁶⁶

对于大型海鲜供应商或当地社区，取决于犯罪分子对其控制当地渔民和供应商的信心如何，他们可能将采购价格或加工费定得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当他们试图博得社区好感时，他们支付的价格可能会高于市场价。⁶⁷例如，在接管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扇贝捕捞社区时，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最初每公斤支付约 22 美元（高于每公斤 19.5 美元的市场价格），并买下了该社区整个季节 22 吨的渔获。⁶⁸当有组织犯罪集团认为他们对渔业合作社有强大的控制力时，他们支付的价格可能会降到只有市场价的 60-75%。⁶⁹南下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海产品加工厂经营者，儿子被毒枭绑架，毒枭胁迫经营者加工贩毒集团的海产品，而犯罪集团支付的加工费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⁷⁰

在下加利福尼亚州、锡纳罗亚州和索诺拉州等地，犯罪集团还以毒品（如甲基苯丙胺）代替现金支付小型渔户。⁷¹这种做法既使渔民变成吸毒者，造成了灾难性的公共卫生影响，又使他们进一步陷入犯罪，因为他们自己不得不在当地零售市场上出售毒品，为家庭赚钱。

在某些情况下，犯罪集团将墨西哥其它地方的渔民带到特定地点参加非法捕鱼活动：例如，锡纳罗亚贩毒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在从锡纳罗亚州带渔民到下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利佩偷捕石首鱼。⁷²在其它地方，犯罪集团将在别处（包括国外）捕捞的海鲜带到一个捕鱼地点，通过当地中间商和加工渠道进行洗白。例如，当尤卡坦州的海参量因过度捕捞而骤减时，在尤卡坦州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始将在哥斯达黎加和拉丁美洲其它地方非法捕捞的鱼带到他们的海产品集散中心。⁷³

在帮助虾群恢复的禁捕期，锡纳罗亚贩毒集团也安排了偷捕虾的活动。在锡纳罗亚州和索诺拉州，贩毒集团组织合法和非法渔民，用大约 2 至 3 万艘渔船在加利福尼亚湾非法捕虾。⁷⁴集团随后将质量较差的虾在墨西哥出售，而将优质的虾运往美国市场，带到美国政府认证的加工厂。这迫使加工厂出具假文件，证明这些虾是在允许捕鱼的季节合法捕捞的。⁷⁵

总体而言，在加工厂，有组织犯罪集团要求加工厂接受并处理贩毒集团购买的海产品。在处理需要冷冻、加工复杂以及需要出具来源和卫生文件的高价值鱼肉、扇贝或牡蛎时，贩毒集团将海产品带到墨西哥（和美国）政府认证的加工厂。如果加工厂拒绝接受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带来的海产品，工厂可能被烧毁，其雇员或业主也可能被杀害。⁷⁶与对待当地渔业社区一样，贩毒集团在加工厂派驻监督员，观察加工情况，并保持详细的账目，以估计集团的费用。据称，在某些情况下，锡纳罗亚贩毒集团自己租了整个加工厂。⁷⁷

据称，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正在开设自己的正式合法海产品加工厂和公司，并雇佣人员开展业务。⁷⁸

对于不需要复杂加工或禁止交易的海产品，如石首鱼、海参和海蜇，犯罪集团自己也可能在渔民港口的基本设施中进行原始加工，包括冷冻、干燥或卤制。贩毒集团在墨西哥销售的产品，如过小的龙虾或虾，也会进行私下加工。

除了收取勒索费，毒枭还强迫餐馆从他们那里买鱼。⁷⁹犯罪集团禁止餐馆从其竞争对手或独立的合法海产品销售商那里购买鱼，试图垄断餐馆的供应链。

犯罪集团还在关键的交通枢纽和路线上部署力量，进行控制，例如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卡洛斯港，非法捕捞的鱼在那里汇集，那里还有用于贩毒的飞机跑道。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向北到恩塞纳达、罗萨里多、墨西卡利和蒂华纳的高速公路上也是如此，犯罪团伙向运送海鲜的卡车收取过路费。⁸⁰

最后，犯罪团伙将从管道中偷来的燃料卖给大型工业渔船以及渔民的小渔船。在锡纳罗亚州，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统治着非法燃料分销和向渔业销售燃料的业务。在塔毛利帕斯州，则是海湾贩毒集团扮演这一角色。⁸¹

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常把它对渔业的接管说成是为当地社区“带来秩序”。为了鼓励对某些鱼类的可持续捕捞，他们有时会设定捕捞配额并加以执行，惩罚捕捞过量的渔民。在其它情况下，如捕捞石首鱼，他们助长了非法捕捞活动。

他们还利用对当地社区可以捕和买多少鱼以及向谁购买的控制，来实现其它目标，如推动他们的毒品贸易。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渔业社区，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指示当地渔民合作社从当地吸毒者那里购买的扇贝不得超过三公斤。设此限制是为了确保扇贝不会耗尽。但是，贩毒集团要求合作社从吸毒者那里购买一定的扇贝，从而给吸毒者提供购买毒品的收入，也可以促进贩毒集团毒品销售的可持续性。⁸²

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因与当地社区，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资本而闻名，集团一直专注于在墨西哥各地提供治理和监管服务以及解决争端机制。⁸³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接管了一个渔业社区，在村里派驻了约7名集团成员，而他们就在市警察局旁边租了两间房子。当村内发生小偷小摸案件时，市政警察让前来报案的人去找隔壁的毒梟，查明罪犯并予以处理。⁸⁴（但毒梟的存在也让村民担惊受怕，人们不敢在外面街道上聚集，也不敢在公共场合举行节庆活动。）⁸⁵

据称，锡纳罗亚贩毒集团还与墨西哥国家官员和 CONAPESCA 官员接触，向他们表示将遵守捕鱼许可证和配额捕捞，由于腐败和政府资源不足，贩毒集团有时会这样做。⁸⁶

在其它情况下，受访渔民表示，犯罪集团与地方当局进行了腐败交易，阻止 CONAPESCA 或墨西哥海军来检查，从而可以进行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⁸⁷

不仅仅是非法的渔民和渔业合作社，就连墨西哥的合法渔民、渔业合作社和联合会以及大型海产品企业也对有组织犯罪的施压感到无能为力，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向墨西哥政府当局谴责有组织犯罪的勒索和接管行为，但往往没有得到墨西哥政府的有力支持或执法行动，有关执法和政府官员强调，他们忙于处理新冠疫情，或受洛佩斯政府的指示，不得公开使用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武力。⁸⁸有时，在向墨西哥当局提出申诉后，他们面临暴力威胁，他们因此怀疑政府腐败、与犯罪分子广泛勾结的可能性。⁸⁹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强迫一名海鲜经营者加工集团带来的海鲜，集团代表告诉他，墨西哥政府不会对贩毒集团强行进入海鲜加工行业采取行动，因为集团在2021年6月的中期选举中为洛佩斯的政党国际复兴运动提供了献金。⁹⁰国家复兴运动在墨西哥许多拥有大型渔业的州赢得了选举，包括下加利福尼亚州、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锡纳罗亚州。⁹¹洛佩斯行政当局所设的 CONAPESCA 专员 Octavio Almada Palafox 是一名政客，对渔业没有任何了解，因此不愿意与渔民和其他渔业代表进行对话。⁹²

大型海鲜企业认为，他们要么选择与毒梟合作，出售业务并搬走，要么或许可以雇用一家私营保安公司。正如墨西哥渔民联合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目前最优的选择就是听毒梟的话。”⁹³ 小户渔民往往无法选择打包搬到其他地方，尽管墨西哥由暴力导致的国内流离失所现象很普遍。一些人考虑建立武装自卫团体，就像墨西哥各社区所做的那样，⁹⁴但这样做显然会带来有组织犯罪暴力报复的巨大风险，也可能遭受政府的惩罚。⁹⁵

此外，被有组织犯罪盯上的渔户之间的团结被许多因素削弱，原因之一是洛佩斯政府提出的新税法，该法案将使只有不属于渔业合作社或联合会等商业协会的渔户有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格。⁹⁶然而，大约340美元的潜在税收利益，即使是由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的，并不能弥补无法加入渔民合作社而带来的谈判、保护和动员权力的丧失。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与中国贸易商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中国野生动物贸易商和贩运者在墨西哥的势力和多层面的网络正在扩大，但中国野生动物贸易商人与墨西哥偷猎者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像贩运其它商品一样，中国在关键的基础设施和运输节点（如墨西卡利）和港口（如韦拉克鲁斯）的投资日益增加，周边的华侨社区也日益壮大，这也为野生动物走私提供了便利。中国的合法企业以及非法网络已经在墨西哥的大型港口韦拉克鲁斯州的韦拉克鲁斯和大西洋边塔毛利帕斯州的坦皮科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坦皮科港口部分归中国公司所有。在墨西卡利，中国黑手党小组参与了合法和非法捕鱼以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前体走私。⁹⁷ 这两组行为者往往都在讨好墨西哥当地官员上大力投入，并与他们以及当地其他知名政客和商人一起积累政治资本。⁹⁸

但在近几年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接管墨西哥的渔业之前，中国贸易商经常与墨西哥渔民直接接触。在尤卡坦近海捕捞海参的最初几年就是如此，最初在太平洋海岸偷捕鲍鱼和石首鱼也是如此。中国贸易商在渔村开展业务，并向当地渔民发放商人所寻海产品的合同。捕捞海参的人还有偷猎石首鱼和鲍鱼的人直接向贸易商出售渔获。中国贸易商组织运输到集散中心和港口，如墨西卡利，然后再将海产品贩运到中国。其中一些产品，如石首鱼或鲍鱼，会被走私到美国，有些在美国的华人消费者中出售，另一些则运往中国。⁹⁹

中国贸易商与墨西哥渔民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现在因墨西哥犯罪集团而改变。墨西哥犯罪集团不让中国贸易商直接从当地渔民那里购买，企图垄断非法和合法的渔业。现在，石首鱼和鲍鱼偷猎者被迫先卖给墨西哥犯罪集团，犯罪集团再卖给中国中间商。¹⁰⁰犯罪集团插足海产品供应链的做法在尤卡坦的海参捕捞业也逐步出现。虽然海参数量还没有恢复，而且持续的偷猎只捞到了少量的海参，但尤卡坦州的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现在从当地渔民那里购买海参，自己再卖给中国中间商，而中国中间商不再被允许直接从渔民那里购买。¹⁰¹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似乎也建立了自己的海产品仓库，如用来存放石首鱼鱼鳔的仓库。石首鱼鱼鳔的储存和加工已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是中国商人和贩运者的专属业务。¹⁰²石首鱼鱼鳔在墨西哥内部运输，储存在坎昆、圣路易斯波托西、蒙特雷和墨西哥城等地，然后被运往美国或中国。¹⁰³

尽管如此，墨西哥犯罪集团似乎并没有强行进入墨西哥以外的贩运和运输活动。这部分贸易仍在中国贸易商的控制之下。虽然中国经纪人在墨西哥各地都有，但只有在一次采访中，受访者知道有墨西哥犯罪集团的代表在中国活动。具体而言，一个在尤卡坦海参捕捞中大行其道的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在中国有一个办事处。¹⁰⁴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现在进入供应链最上游与中国中间商打交道，利用中国市场需求最高的新海产品来牟利。其中一种产品是海蜇，这在中国是一道美味佳肴。在过去的五年里，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周围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石首鱼偷猎的中心和关键的毒品转运中心，现在开始出现海蜇大量捕捞的现象。中国中间商注意到，据估计，那里的海蜇捕捞比捕虾更有利可图。¹⁰⁵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正在指挥当地渔民何时何地可以捕获海蜇，并对其征税。贩毒集团还鼓励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其它地方和墨西哥其它地区（如锡纳罗亚州）的渔民参与捕捞，以此获得收入。在海蜇大量捕捞的时期，圣克拉拉的居民人口暴涨，临时工人从 5000 人增加到 15000 人。到了陆地上，海蜇被晒干、腌制，或浸在盐水中、封在密封袋里，然后分类出口，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在加工厂内设有“会计”，记录加工海蜇的数量，并计算向贩毒集团支付的费用，约为 2021 年秋季销售额的 15%。¹⁰⁶据估，当时向中国出口了约 1500 吨海蜇，同时也在建造新的加工厂。¹⁰⁷

一些中国海蜇出口商，如在锡纳罗亚州的出口商，利用海鲜出口作为掩护，将芬太尼和甲基前体带入墨西哥。¹⁰⁸

最重要的是，与墨西哥犯罪集团打交道的许多中国海产品贸易商出售允许捕捞和运输的海洋物种，或将非法商品混于合法商品中，并在墨西哥经营其它业务，如超市和餐馆。虽然一些中国中间商寻找如石首鱼等非法商品，且有意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并转移价值，但其他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在与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打交道。几位来自墨西哥大型海产品出口商的受访者和渔民联合会官员指出，中国买家“最关心是否有从墨西哥出口鱼类的合法文件”和海产品的来源文件，尽管“他们并不关心文件是如何获得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他们得到这些文件，能糊弄过当局就行了。”¹⁰⁹

墨西哥大型海产品企业，特别是那些与中国中间商打交道的企业，仍然能够直接与中国中间商做生意，因为墨西哥各地的渔业犯罪接管状况不尽相同，也可能因犯罪集团在当地的决策而不同。此外，一些墨西哥大型海鲜出口商可能尚未受到犯罪集团的施压，或迄今只要求支付勒索费。另一些出口商可能面临有组织犯罪集团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要求，例如将其加工厂交由毒枭完全处置。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海鲜贸易商比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得多。

有时，中国犯罪集团也在墨西哥活动，特别是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犯罪集团尚未建立起专属的领土控制权，暴力争夺现象或许仍然存在。例如，一位来自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渔民描述了他的朋友在恩塞纳达，因为没有兑现承诺，交付非法捕捞、价格高昂的鲍鱼，被他所指的“中国黑手党”折磨致死的情况。鲍鱼所属的海洋物种，由于过度捕捞，其中一些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处于濒危状态。¹¹⁰

最后，墨西哥专属经济区周围的中国捕鱼船队也可能非法捕鱼，给鱼类带来巨大威胁。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的顶级掠食者（如各种鲨鱼），以及其它大型浅海物种（如蝠鲼），都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中国捕鱼船队的规模及其对墨西哥水域的渗透程度似乎远不及在厄瓜多尔、阿根廷或智利的程度。例如，在智利，中国捕鱼船队的几百艘船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捕尽鱼群并破坏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但是，墨西哥对专属经济区的监测几乎不存在。墨西哥海军在海上的能力已经急剧下降，因为海军人员一直忙于在陆地上开展反犯罪和禁毒行动。尽管海军有几艘全新的船只，但船员和燃料都严重不足。许多海军资产仍然停泊在墨西哥港口，未来海上部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¹¹¹墨西哥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认为，他们多年来要求墨西哥政府加大监测中国捕鱼船队的力度，并对侵犯专属经济区的行为采取行动，但政府没有做出足够的回应。¹¹²

III. 洗钱和价值转移

墨西哥和中国的野生动物贸易也日益成为转移非法经济价值的机制，也可以绕过美国和墨西哥银行的反洗钱机制以及中国的资本外逃管制。中国的管制措施意味着中国公民每年转移出境的资金不得超过 5 万美元。¹¹³Drazen Jorgic 在 2020 年 12 月的路透社调查中详细介绍了在墨西哥运营为贩毒集团洗钱的中国地下银行系统，这一系统也渐渐替代了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洗钱者。¹¹⁴一些洗钱者将野生动物出口业务（如海蜇）作为掩护。

然而，利用野生动物在墨西哥和中国犯罪网络之间进行洗钱和非法价值转移的情况不止于此。这也不仅仅是来自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或非法伐木的资金通过银行或贸易系统进行洗钱的问题，后者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包括七国集团和联合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¹¹⁵

在墨西哥，越来越多的石首鱼鱼鳔、其它海洋和陆地产品以及木材被贩毒集团用来支付制造非法毒品所需的前体。¹¹⁶野生动物产品的成本价和零售价之间差异巨大，使其成为洗钱和价值转移的理想工具。墨西哥渔民卖 1 美元的海参，在香港可以卖到 70 美元。¹¹⁷这除了使非法贸易有利可图之外，巨大的利润还可以隐藏非法资金。

这种跨越两个非法经济体的价值转移比一个贩运网络走私多种商品并利用相同的物流路线和腐败网络更为先进。这一现象在 2020 年的美国 Apex 行动中发现，该行动针对的是从墨西哥走私石首鱼鱼鳔（花胶）、鲨鱼鳍（鱼翅）以及毒品、钻石和贵金属的在美中国公民。¹¹⁸这涉及支付非法商品和洗钱的行为。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以野生动物换前体在洗钱中占多大比例。¹¹⁹野生动物商品产生的价值或高达数千万美元，可能接近墨西哥贩毒集团应付给中国中间商前体交易的价值，这一交易可能也值数千万美元。尽管如此，以野生动物交易的方式不太可能取代其它洗钱和价值转移方法。但是，这种支付方式越来越常见，这可能会破坏墨西哥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因为贩毒集团试图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获取越来越多种多样的动植物，以支付毒品前体的费用。

同样，在南非，中国三合会向当地帮派提供海洛因，来支付在开普敦周围偷猎的费用。¹²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还没有发现这种以野生动物换前体的交易，¹²¹但是，鉴于那里偷猎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规模巨大，需要我们对此引起警惕。

IV. 中国与墨西哥在打击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外交和执法合作

任何形式的执法合作在墨中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历来很小，现在仍然微不足道。中国大多不承认在墨西哥偷猎并贩运到中国的责任，且将环境执法的责任归于墨西哥。只有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特别是在贩卖石首鱼鱼鳔上，中国才会采取有限的拦截行动，以阻止被盗猎的野生动物从墨西哥流向中国。要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拦截行动需要与墨方进行有意义的情报共享，但这迄今为止都十分缺乏。这种拦截行动也需要持续下去，并扩大到其它被贩运的物种上。

然而，墨西哥政府尚未作出重大努力，鼓励中国参与执法合作，包括在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合作。中墨关系以经济合作和竞争为中心，需要巧妙把握外交平衡。虽然墨西哥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也经常把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¹²²但是，在其它方面，墨西哥努力保持与中国积极友善的关系，一般不评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洛佩斯当局来说，这种沉默不言是其强调主权和避免批评外国领导人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¹²³

对零售市场的阻截和打击

中国与墨西哥在野生动物贩运问题上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石首鱼的走私上，因为这个问题以及使小头鼠海豚走向灭绝的误捕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并对墨西哥和中国政府产生了压力。即便如此，当墨西哥外交官在国际和墨西哥环境活动家的带领下，提出中国对石首鱼鱼鳔的需求问题时，中国政府当局起初完全没有回应。¹²⁴

在最近中国削弱香港自治权（这可能会减少香港与国际执法同行合作的能力）之前，墨西哥和中国最有力的执法合作主要是和香港海关，特别是在石首鱼和其它野生动物商品的走私方面。¹²⁵在墨西哥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海关官员甚至偶尔会允许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接触被扣押的墨西哥野生动物产品，即使他们不能收集样品，至少也可以眼见为实。¹²⁶但与此同时，即使在香港，由于其对野生动物贸易执法的关注度要高得多，海关当局也会将缴获的野生动物产品交给中国的中医学校和制药公司进行实验，以确定潜在的商业用途。¹²⁷

墨西哥和中国从未联合开展过任何野生动物贩运调查和执法行动。然而，面对来自墨西哥涅托当局、美国政府和国际环境界的巨大压力，在中国海关官员几次查获大量石首鱼鱼鳔后，中国终于在2018年对石首鱼鱼鳔走私者和贩卖者采取了几次阻截行动。最受关注且规模最大的拦截行动发生在2018年12月，是中国的秘密行动“SY608”的最终任务。拦截行动对广东和广西省各市的石首鱼鱼鳔商家进行突击检查，16名石首鱼贸易商被捕。¹²⁸在墨西哥外交官的敦促下，中国当局也加大了对走私石首鱼的处罚力度。¹²⁹

中国的石首鱼贩运者也进行了调整，从原先的商店橱窗成列和公开展示变为现在的藏于地下私人酒窖，通过私人通信平台进行网上销售。¹³⁰这种隐秘的销售方式与打广告、公开展示石首鱼不同，使情报收集和拦截行动更加困难，需要开展控制下交付及卧底行动。此外，执法当局往往难以分辨石首鱼鱼鳔与其它品种黄花鱼的鱼鳔，这些黄花鱼在世界各地都有捕捞，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和法属圭亚那沿海，越来越多的渔获被送到中国市场。¹³¹可持续做法以及对新捕获黄花鱼的有力检测少之又少。

中国继续缉获走私的石首鱼，这表明贩运活动仍在继续。2020年6月，中国当局缉获了20多年来数量最多的石首鱼鱼鳔，价值超过300万美元。¹³²香港海关在2021年7月又检获另一批鱼鳔，不过数量要小得多。¹³³然而，除了在港口和机场检查，似乎没有对石首鱼贸易商和走私网络进行其它的阻截。

然而，仅仅依靠稽查没收本身是不够的。贩运者可以轻松采取多种对策，包括订购更多的野生动物产品，从而诱使从野外偷猎更多的动物。因此，如果缉获野生动物无法导致整个贩运网络的瓦解，那么仅仅这样做实际上会适得其反。¹³⁴但是，正如美国过去十年来对石首鱼偷猎者的拦截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在美国的许多华人石首鱼偷猎网络（走私路线有时会经过这些网络）是相当小且分散的。这意味着，即使整个网络在中国境外被端掉，其它网络也能很快取而代之。¹³⁵因此，不断进行阻截行动至关重要。

中国对与墨西哥有关的野生动物贩运的公众叙述

中国关于墨西哥和国际野生动物贩运的舆论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主要侧重于转移国际批评，很少（如果有的话）承认中国在助长墨西哥或非法野生动物贩运上的作用。

尽管中国继续在中国港口扣押石首鱼货物，并在几年前对中国贸易商采取了阻截行动，但其公开声明很少提及来自墨西哥的野生动物贩运。中国官员经常反驳美国、墨西哥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说法。例如，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中国环境破坏情况说明》¹³⁶，其中指责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大的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消费国”¹³⁷，中国用自己2020年10月的《美国环境破坏情况说明》作为回应¹³⁸，其中引用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称美国是野生动物贩运的主要目的地和消费国，强调向美国偷运“麦氏托头鱼”，即墨西哥的石首鱼（*Totoaba macdonaldi*）。¹³⁹中方没有提到美国是运输石首鱼到中国线路上的经由国。相反，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媒体，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方报纸和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人民日报》，将美国的说法描述为“诬蔑”和“大笑话”。¹⁴⁰北京还指责美国是虚伪的，对自己的环境不法行为视而不见。¹⁴¹为了证明美国对野生动物贩运的罪责，中国的反驳说明引用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即在2005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占全球野生动物缉获量的38.5%，但没有提到美国的高缉获率可能意味着美国比其它国家更愿意将执法资源用于打击野生动物贩运。因此，缉获量不仅是违禁品流动程度的一个指标，而且可能也是执法力度的一个指标。

中国政府官员和媒体，绝大多数与政府有关联并由政府控制，广泛强调中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成功和进步，践行习近平主席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¹⁴²他们还宣传中国在国内外的环保工作所获得的任何赞誉和国际认可，同时淡化或驳回批评意见。中国政府官员和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研究机构的声明也强调了中国在制止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国际合作。例如，2020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其关于如何在中国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七条详细建议中强调了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国际合作，并列出了解决中国执法中不作为和不及时的方法。¹⁴³在强调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功时，《中国日报》等中国媒体也强调了中国在积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分享其环境保护知识和经验，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寻求像中国一样实现经济增长。¹⁴⁴

反洗钱工作

截至 2022 年 2 月，中国尚未与墨西哥合作开展金融情报和反洗钱工作，以打击来自墨西哥的非法野生动物流动及其收益。¹⁴⁵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财政部和欧洲刑警组织将中国的洗钱者认定为“主要威胁”。¹⁴⁶中国洗钱者扮演的角色似乎越来越大，已经不限于亚洲，而是扩展到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中美洲。¹⁴⁷中国的洗钱者依靠基于贸易的洗钱手段，并使用加密货币，如门罗币、比特币和以太坊，也在中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中进出资金，尽管中国对资本外流有严格的控制。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资本外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防止资本外流一直是中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首要任务。¹⁴⁸

在过去两年，中国大力加强了反洗钱的执法措施。但是，中国的执法工作远没有对所有洗钱活动撒下一张大网，而是更狭隘地着眼于阻止中国资本外逃，包括通过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在线赌博进行的资本外逃。事实上，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多执法联络官都致力于应对这一问题。¹⁴⁹中国与多边执法机构合作开展此类反洗钱行动时，如果行动涉及中国或香港的银行系统，中国不会与任何“五眼”情报共享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¹⁵⁰中国正在本国立法中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将与野生动植物贩运有关的洗钱活动纳入其中。¹⁵¹然而，中国国内的这些反洗钱努力并不意味着中国愿意与墨西哥或美国合作，进行任何有关野生动物犯罪的广泛国际合作调查和起诉。¹⁵²

然而，地缘政治对中国反洗钱工作的限制以及反洗钱工作功能选择性，也需要结合中国反洗钱能力的整体局限性来看，在资源和程序方面，中国在金融和银行部门的反洗钱法律和法规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正如一名前执法官员所说，“实话说，在纸面上达到西方的反洗钱标准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长足的进步了。”¹⁵³

三边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努力

美国和墨西哥政府也曾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参与打击石首鱼贩运问题的三方讨论，大部分石首鱼贩运仍会经过美国。¹⁵⁴然而，中国政府反对将技术讨论变成永久性的三边合作论坛，更不用说将从中国贩运到墨西哥的野生动物产品纳入讨论范围内。在中国-墨西哥野生动物贩运问题上，中国强烈希望以非正式个案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不用受任何长期议定书或合作承诺的约束。¹⁵⁵美墨中三方在打击石首鱼贩运问题上的外交活动仍毫无进展。

与此同时，在总统洛佩斯的领导下，墨西哥政府对石首鱼贩运在外交上的优先级别发生了变化。这些努力的重点是防止墨西哥遭受国际制裁，因为正如《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2019 年缔约方会议所指出的，墨西哥在打击偷猎石首鱼和防止小头鼠海豚被误捕方面完全失败。¹⁵⁶墨西哥还设法让 CITES 将石首鱼从濒危物种清单中移除，这样就可以合法捕捞和出口该物种。¹⁵⁷这两种做法都可以免除墨西哥政府对偷猎者采取执法行动的责任。

2022年3月，CITES批准了养殖石首鱼鱼肉的合法贸易及出口，但捕捞野生石首鱼以及任何鱼鳔贸易（包括养殖鱼的鱼鳔）仍然是非法的。¹⁵⁸然而，尽管不断扩大的石首鱼养殖业有可能雇用一些石首鱼偷猎者，但CITES的新规不可能大大减少偷猎石首鱼的现象，因此只要使用刺网，小头鼠海豚就可能面临灭绝之灾。高价的鱼鳔市场仍将是非法的，因此鱼鳔会通过非法捕鱼来供应。此外，即使有一天建立了石首鱼鱼鳔的合法市场，水产养殖石首鱼在未来几年也无法与来自（合法或非法）野生捕捞的雌鱼的鱼鳔竞争，因为鱼鳔的价值取决于大小，因此也取决于鱼龄。但是，合法的鱼鳔市场（如来自养殖场的鱼）可以洗白非法捕捞的石首鱼鱼鳔。根据目前的规定，养殖场的石首鱼只有鱼肉可以出口，因此养殖场要销毁鱼的鱼鳔，以免鱼鳔流入非法市场。

此外，中国与墨西哥在打击野生动物贩运方面基本上没有开展合作，中国对石首鱼贩运的阻截工作只是一个例外。正如一位来自中国的野生动物贩运和中国执法问题专家在采访中对我说的那样，“在中国，石首鱼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执法的原因，至少有一段时间进行了执法。”¹⁵⁹石首鱼的事表明，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中国可以做出回应，至少有暂时的回应，打击国内非法商品的零售市场。但是，这一暂时的努力并没有衍生为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更广泛的合作。中墨在打击从墨西哥向中国贩运野生动物方面的外交接触仍然“非常缓慢、复杂、笨重，而且远远不够有力”。¹⁶⁰因此，保持国际压力，迫使中国关闭其有问题的零售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中国在2018年之所以愿意对非法石首鱼销售进行突击检查，是因为中国仍希望将打击野生动物贩运合作作为缓解美中关系紧张的一种机制。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双方关系仍没有得到积极改善，中国也更不愿意在国际野生动物贩运问题上进行合作。¹⁶¹

法律援助

中墨执法合作还继续面临语言困难和法律挑战，墨西哥和中国的司法和执法官员会讲汉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的人有限，两国法律体系也使得国际合作更复杂。因此，墨西哥和中国在法律援助问题上的接触一直是零星、零散的，两国都缺乏对当前问题的全面了解，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参与渠道。在这两个国家，各机构和部门都不主动分享信息，故意拖延时间，还绕过其它部门。¹⁶²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历来很少与墨西哥外交部分享信息，甚至在总检察长办公室与中国政府接触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种官僚主义的各自为政在洛佩斯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¹⁶³

相比之下，美国和墨西哥在打击野生动物贩运上的合作范围更广，涵盖了更多的物种。例如，虽然中国没有关注向中国贩运海参或鲍鱼的问题，但这两者一直是美国野生动物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即使打击海参和鲍鱼贩运在墨西哥国内面临执法挑战。¹⁶⁴几年前，美国政府发现了非法且不可持续的流动，并对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进口海参进行了限制，并要求对合法捕捞进行认证。CONAPESCA证明生产商和出口商遵守了所有的许可和配额要求，这些文件是海参合法进入美国的必要条件。美国边境检查人员还评估进入美国的海参是否确实是美国允许进口的特定物种。然而，很多受访者认为，CONAPESCA及其认证过程都充满腐败，有时是因为被毒枭持枪威胁。¹⁶⁵但是，尽管监管和执法过程并不完善，这显示了美国方面愿意承担共同责任，制止在墨西哥非法且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物种的捕捞。这与中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V. “墨西哥应自行解决”：墨西哥的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与挑战

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应该由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境内执行法律，打击偷猎和贩运活动，这不是中国的问题。¹⁶⁶

但与打击毒品贸易一样，这种做法面临着许多挑战。即使在洛佩斯总统上台前，许多环境机构就很薄弱，缺乏针对环境犯罪的强制力、监管人员和资源，而且预算也很紧张。例如，从2015年到2019年，在涅托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处（Secretaría de Medio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SEMARNAT）的预算被削减了61%。墨西哥的许多环境机构也普遍存在腐败现象。¹⁶⁷该国环境法规执行一向薄弱，在洛佩斯执政期间已基本不复存在，洛佩斯政府进一步削减了政府环境监管机构的预算和人力资源。¹⁶⁸例如，2020年6月，洛佩斯政府将国家自然保护区委员会（CONANP）的预算削减了75%，该委员会相当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覆盖全国22%领土的182个自然保护区。¹⁶⁹除了直接导致的200名员工被裁员，政府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削减。包括国家林业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Forestal）在内的其它重要墨西哥政府环境机构，预算也遭大幅削减。¹⁷⁰

洛佩斯政府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系统性问题，政府不允许采取任何需要墨西哥执法机构（包括陆军、海军和高度军事化的国民警卫队）公开使用武力，尤其是致命性武力的执法行动，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愤怒的暴民，如参加抗议的石首鱼偷猎者、任何其他抗议者，甚至武装民兵时，都不得使用武力。¹⁷¹这是墨西哥政府所谓的“拥抱而不是开枪”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试图依靠使用社会经济政策来解决犯罪，已经严重缩减了执法行动。¹⁷²此外，洛佩斯政府虽然名义上将大部分打击犯罪行动的责任交给了市政府和州政府，但也严重削减了它们的预算，而这些执法队伍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¹⁷³这意味着自2020年底以来，由于墨西哥执法队伍试图避免引起石首鱼偷猎者的反政府暴力骚乱，因此没有在海面上或陆地上对石首鱼偷猎者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在2020年及之前发生的暴乱中，参加抗议的石首鱼偷猎者烧毁了政府的船只、办公室和汽车，并偷走了武器。¹⁷⁴由于这个原因，2020年12月，墨西哥政府也暂时关闭了两个重要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以及“鲸鱼与海洋科学博物馆”，这两个组织主要移除了会缠绕小头鼠海豚的刺网，而偷猎，包括在小头鼠海豚保护区内的偷猎，不受影响，呈爆发式增长。¹⁷⁵2021年秋天，墨西哥政府与这两个非政府组织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允许它们回到小头鼠海豚的保护区进行巡逻，不过墨西哥政府没有重新授权允许组织接近偷猎者或移除会导致小头鼠海豚死亡的刺网。¹⁷⁶

洛佩斯政府开展的重要阻截行动都是在不公然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突袭。的确，在下加利福尼亚州，对石首鱼贩运者进行了有力的打击。2018年，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创建了一个新的反野生动物贩运拦截单位，尽管该单位规模不大，而且广泛关注从木材到石首鱼贩运等各类环境犯罪，但这一单位对野生动物贩运进行了专门调查。随着海军开展逮捕，该单位因此在2020年11月牵头起诉了七名关键的石首鱼贩运者，包括绰号为“阳光”的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佩纳（Antonio Rodríguez Peña）。¹⁷⁷随后在墨西哥进行的拦截行动也导致两名华裔因偷猎石首鱼而被捕。然而，被捕者尚未受到审判。逮捕也没有长久的威慑作用。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偷猎石首鱼和其它使用禁止的刺网捕鱼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基本上没有任何执法行为进行打击。¹⁷⁸

在墨西哥，打击其它野生动物的偷猎和贩卖执法工作做得更差。洛佩斯政府巨额削减了所有环境机构的预算，解雇了数百人，包括高度敬业、有能力、有成就的环境保护官员。¹⁷⁹墨西哥的各种能力都已萎缩。

不仅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在防止与环境破坏有关的公共健康风险上能力也有萎缩。例如，十年前美国在人畜共患疾病检测项目 PREVENT 下对墨西哥环境官员进行培训，但现在墨西哥从被偷猎或因其它原因死亡的动物身上提取样本以识别可能存在的人畜共患疾病的能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¹⁸⁰洛佩斯政府在经济上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并主要侧重于收取关税，因此对在美墨边境建立强有力的人畜共患疾病监测控制不感兴趣。¹⁸¹

墨西哥海关法也使检查交易的野生动物产品变得复杂。海关法本身就非常复杂，法律未能对受环境保护的产品和未受环境保护的产品进行有意义的区分，在海关法中指定物种非常少。因此，出口和收缴的货物往往只被列为“非指定产品”，导致有关部门对墨西哥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的情况非常不了解，并阻碍了对走私网络的调查。¹⁸²

当然，墨西哥的公共生活腐败丛生，腐败乱象几乎涵盖了该国所有负责国家、州和市层面的环境保护执法和监管机构。

VI. 结论和建议

墨西哥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问题呈增长趋势，渗透范围已超出该国境内的传统市场而进入整个美洲地区。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墨西哥非法捕捞的动植物的重要转运地和目的地，但是中国在墨西哥野生动物贩运中所起的作用正在增加，而且往往是扮演着不为人知的角色。中墨两国之间野生动物产品的合法贸易不断扩大，也成为洗白偷猎的动植物及为毒品收益洗钱的一种手段。合法和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也用来支付来自中国的前体，以在墨西哥用于非法毒品生产。随着关系模式的转变，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与中国野生动物贸易商和贩运者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

应对墨西哥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和基本生态健康所面临的威胁，既是一个执法、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也是一个环境科学问题。虽然洛佩斯政府对环境保护兴趣不大，削弱了法规，并削减了资源本就不足的环境监管和执法机构的预算，但实地环境执法行动和对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就地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就地保护需要解决墨西哥机构能力薄弱以及该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过于强大暴力的问题，这些集团正在大力扩张其在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经济中的势力。这需要墨西哥政府有意愿和能力，打击这些团体，不让他们腐蚀、恐吓政府环境官员以及野生动物猎人、渔民、生产商和贸易商。

但是，在国际层面上也需要采取有意义的举措来应对墨西哥的野生动物贩运问题。保护工作需要需求国与转运国和供应国之间的有力合作，特别是在打击跨境野生动物贩运网络上。因此，扩大墨西哥和中国在打击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如果能与美国进行三边合作将会是最有效的。

应对墨西哥日益增长的野生动物贩运威胁具有挑战性，因为墨西哥的法治极其薄弱，洛佩斯政府又不愿意强力对抗墨西哥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而且中国也不愿意与墨西哥进行有力的环境执法合作。因此，以下建议应被视为总体指导方针，但受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合作状况影响，这些建议无法得到迅速采纳。此外，所有这些方针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野生动物贸易和贩运进行调整。

其中一些建议，如就地执法或找到可替代的合法收入，可以由墨西哥单独进行，但中国和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建议的执行。而在其它方面，例如捣毁中国非法零售市场，则应主要由中国政府负责。但是，墨西哥和中国可以帮助提供关于走私网络的情报或金融情报。

执法

需要通过缉获的商品详细查明野生动物贩运网络，并进行系统性且强有力的努力，以捣毁这些网络。只要需求持续存在，就会有新网络取代旧网络，但即使破坏是暂时的，也能给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一些恢复的机会。

捣毁野生动物贩运网络的重点应该是在一次性逮捕尽可能多的中层负责运营的人员，尽量减少网络再生能力，这一政策远比逮捕野生动物走私“头目”（尽管这符合道德观念）或抓捕大量低层级的偷猎者更为有效。在墨西哥，这意味着既要有追捕中国贸易商和贩运者的意愿，也要有针对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有效执法策略，这一点非常关键。

阻截需要精心设计，以避免因更大的缉获量而导致更多的偷猎，产生反效果，因为贩运者会预期在执法拦截工作中失去一定比例的违禁品，因此下达更多的非法偷猎动植物订单来应对。

现场执法仍然是打击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墨西哥，这需要墨西哥政府有对付偷猎者的意愿，即使偷猎者可能对政府进行暴力反抗。

无论是阻截还是现场执法，要产生威慑力就需要有足够频繁的起诉。高额但频率少的处罚既不会阻止也不会彻底削弱犯罪网络的能力。惩罚力度不大，但有效起诉的可能性高，会产生更有力的威慑效果。

打击偷猎的经济激励措施

有效的现场执法也需要协助当地社区发展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流动性，创造可持续的合法收入，无论是在生态旅游还是其它方面，如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其它行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如此。在墨西哥，这种合法的经济机会包括对海洋物种的可持续捕捞，以及对陆地物种的狩猎、放牧或在 UMA 制度下的采伐，该系统（或其它机制）授予土地所有者和当地社区对其土地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利。创造这种合法的经济机会需要巧思，也需要发展增值链和市场准入，并消除腐败。

因此，政策应允许可持续的狩猎和捕捞，这样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在促进保护方面就有了切实的利益。但是，墨西哥必须在许可及监督墨西哥的陆地和海洋物种捕获方面加倍努力。无论是大型出口商还是小型社区合作社的合法贸易，都被用来洗白偷猎来的动物和植物。因此，墨西哥政府必须愿意进行有力且频繁的检查，惩罚违法者，同时保护人民免遭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恐吓。

狩猎可以是可持续的，并且可以使环境受益，例如狩猎可以控制数量过多的物种。如果由于偷猎、栖息地破坏或其它原因，关键性捕食物种的数量减少，就更需要狩猎。偷猎和不可持续地猎取最顶端捕食者尤其成问题，因为这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大规模影响。事实上，如合法贸易一样，并非所有偷猎行为都会威胁到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健康。在缓冲区，甚至在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允许有限的非濒危物种狩猎和有限的可持续自然资源开采，以缓解当地贫穷社区的粮食不安全和收入损失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必须逐案评估何种狩猎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持续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只要有可能，就应给予当地社区保护区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可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获取收益的权利，例如在 UMA 制度下进行。边缘化的社区应得到援助，以确保其权利，并应在土地使用和保护方面有强有力的发言权，以实现环境公平和可持续性。所赋予的权利应是有限的，并对使用加以限制，以确保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应允许社区摧毁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可持续的伐木或为生计或战利品狩猎非濒危物种，或在保护区进行有限的放牧，都可允许。

这种有条件的权利还应包括社区享有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所得收入的 100%，但收入应被征税，这样外部政府可以支持地方社区的努力。有了这些税收收入，国家可能不再那么愿意参与外部偷猎和砍伐森林的活动，或者在其他行为者，如野生动物贩运者或伐木业，威胁到社区的资源时，置社区于不管不顾之地。所有这类安排都需要定期监测和重新评估，当地社区也要提供有力的贡献。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合法的替代方案，捐助者可能不得不付钱给人们，让他们不要偷猎，并进行认真的监测，附加条件也需满足。¹⁸³以前对渔民不在科尔特斯海的小头鼠海豚活动范围内捕鱼的补偿计划已经失败，需要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¹⁸⁴

需要定期且反复进行仔细的监测和评估，以重新评估野生动物种群和生态系统是否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因为有限开发的影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墨西哥在监测方面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可供借鉴，比如塞里人（Seri）原住民他们对于蒂布龙岛的沙漠大角羊种群的捕猎，¹⁸⁵这表明如果墨西哥政府有政治意愿来更好地实施执行环境政策时，有能力这样做。

然而，当腐败、逃避法律和洗白野生动物活动无处不在时，决策者需要愿意采取针对特定物种的临时禁令和地区禁令，并暂时吊销许可证，例如当墨西哥鳄鱼养殖场或UMA许可证持有人中发生大量违法行为时。发生大量违法行为的农场、渔场或渔业社区，以及墨西哥政府为防止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恐吓和报复而提供执法支持的地方，许可证应被暂时吊销。

保护工作的资金来源必须向生态旅游以外的多样化筹资方向发展，例如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或其它方式为生物多样性定价。¹⁸⁶

关闭有问题的市场

需要通过说服和宣传运动以及通过执法来彻底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零售和需求市场。对于如购买来自墨西哥的海龟和爬行动物的小买家与投机商、投资者和大量消费被禁野生动物产品（如石首鱼）的人，应有不同惩罚。墨西哥与国际论坛和合作伙伴合作，应尝试鼓励中国做出更坚定、更有力、更持久的努力，打击在中国生产的野生动物产品的零售和贩运，不仅只关注石首鱼，也应扩大到鱼翅、鲍鱼和海参以及陆生物种上。要执行这种禁令，就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可以预料到的是，这种禁令将推动野生动物和肉类的地下或线上贸易，例如中国发生的石首鱼突击行动。必须切实有效地查明并起诉违法者，这可以对秘密犯罪产生威慑作用。

鼓励中国提高与墨西哥和美国进行有意义合作的意愿，打击与野生动物产品有关的洗钱行为以及用野生动物为毒品贸易提供付款的现象，也会有所帮助。尽管这种反洗钱行动不会使打击到野生动物贩运活动的资金，也不会使野生动物贸易商或贩毒集团破产，但这种金融情报可以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从而能够对中层贩运者和整个走私网络采取有效行动。¹⁸⁷

当务之急是要抑制导致重大生态损失的野生动物产品的供需，如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获取和偷猎来生产的中药。中药不应再以受到威胁或濒危的野生动物作原料。但是，为中药采购非法野生动物成分的压力似乎正在向墨西哥蔓延，瞄准了如美洲豹等动物。

保护保护者

不幸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墨西哥或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采纳这些建议，更广泛地开展有力的努力和合作，打击墨西哥的偷猎活动和来自该国的野生动物贩运现象。

至少，墨西哥政府必须愿意保护墨西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者——环境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保护的意愿也需比迄今所表现出的大得多。

令人遗憾的是，墨西哥的环境保护者需要做好准备，既要应对墨西哥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危险压力，又要应对日益严重的野生动物贩运活动，这些活动与中国和其它市场有关的暴力有组织犯罪集团关联更加紧密。

作者简介

Vanda Felbab-Brown 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她还担任布鲁金斯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倡议的主任，以及非洲安全倡议的联合主任。**Felbab-Brown** 博士是国际和国内冲突、叛乱、恐怖主义、城市暴力和非法经济方面的专家。她的实地工作涵盖阿富汗、南亚、缅甸、印度尼西亚、安第斯地区、墨西哥、伊拉克、非洲之角、尼日利亚和其它非洲地区。她撰写了五本书：《黑色毒品：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警察和腐败》（即将出版）；《灭绝市场：野生生物贩运及其应对策略》（2017）；《武装分子、犯罪分子和军阀：无序时代地方治理的挑战》（2017，与 Shadi Hamid 和 Harold Trinkunas 合著）；《抱负与矛盾：阿富汗反叛乱和国家建设的战略与现实》（2013）；以及《飙升：反叛乱和毒品之战》（2010）。**Felbab-Brown** 博士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从哈佛大学获得政府学学士学位。

鸣谢

我衷心感谢匿名评审员提出的非常有益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 Kristin Nowell 提供的宝贵实地研究建议以及其他几位匿名研究人员的贡献。我还想感谢 Nathan Paul Southern 和 Lindsey Kennedy 的调查工作，他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找到了更多能为报告做出贡献的人，接受这个项目的采访。我也非常感谢 Bradley Porter, Abigail Zisus, Wazhma Yousafi 和 Ryan Harbison，他们为我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和其它项目支持，同时感谢 Cindy Zhou 出色的中文研究及其它方面的支持。我还想由衷感谢 Ted Reinert 对报告的出色编辑，以及 Rachel Slattery 的精美排版。最后，我要深切感谢墨西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的所有受访者，他们愿意与我交谈，有时冒着被专制或腐败的政府官员或有组织犯罪集团严重报复的风险。

布鲁金斯学会感谢美国国务院和战争与和平报告研究所为这项研究提供资金。

¹ 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野生动物贩运及如何进行应对》（纽约和伦敦：Hur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以及 Craig Simmons, 《贪得无厌的龙：中国的崛起对自然世界的威胁》（纽约：St. Martin's Griffin, 2013）。

² 《墨西哥总统下令对项目进行自动审批》，美联社，2021年11月22日，<https://apnews.com/article/business-mexico-caribbean-environment-regulatory-agencies-598589970794270a7db908dbd662e976>。

³ Alejandra Leyva Hernández, Rita Chantal Reyes Medina, Cristina García Bravo 和 José Carlos Juárez Pérez, 《2019年墨西哥环境人权卫士处境报告》，（墨西哥城：墨西哥环境法中心，2020年3月），<https://www.cemda.org.mx/wp-content/uploads/2020/03/informe-personas-defensoras-2019.pdf>。

-
- ⁴ 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墨西哥失控的犯罪市场》, (华盛顿特区: 布鲁金斯学会, 2019年3月),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mexicos-out-of-control-criminal-market/>; Vanda Felbab-Brown, 《墨西哥民兵的崛起: 保护公民的安全还是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棱镜》, 第5卷, 第4期, 2015年12月, 173-186页,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Rise-of-Militias-Mexico.pdf>; Vanda Felbab-Brown, 《2022年墨西哥的犯罪和反犯罪政策: 前景黯淡》, 今日墨西哥, 2022年1月21日, <https://mexicotoday.com/2022/01/21/opinion-crime-anti-crime-policies-in-mexico-in-2022-a-bleak-outlook/>。
- ⁵ 请参阅 Martha Pskowski, 《毁林和采矿对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威胁》, Mongabay, 2018年12月19日, <https://news.mongabay.com/2018/12/deforestation-and-mining-threaten-a-monarch-butterfly-reserve-in-mexico/>。
- ⁶ 对墨西哥的非法采伐情况的系统概述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之内。请参阅 Deborah Bonello, 《贩毒集团如何进入墨西哥的非法伐木行业》, 犯罪洞察组织 (InSight Crime), 2020年9月18日, <https://insightcrime.org/investigations/drug-cartels-illegal-logging-mexico/>。
- ⁷ 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消失的小头鼠海豚与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 2017年6月5日,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6/05/the-vanishing-vaquita-and-the-challenges-of-combating-wildlife-trafficking/>, 和 Vanda Felbab-Brown, 《拯救小头鼠海豚与今秋的迫切事项》, 今日墨西哥, 2020年10月11日, <https://mexicotoday.com/2020/10/11/opinion-saving-the-vaquita-marina-urgency-of-this-fall/>。
- ⁸ 对于墨西哥野生动物市场的研究, 请参阅 Ines Arroyo-Quiroz 和 Tanya Wyatt 编, 《墨西哥的绿色犯罪: 案例研究集》(纽约: Palgrave-Macmillan: 2018)。
- ⁹ 笔者对墨西哥环境保护政府官员的采访, 2011年10月, 墨西哥。
- ¹⁰ Rene Ebersole, 《蜂鸟爱情挂饰交易黑市的内幕》, 《国家地理杂志》, 2018年4月18日,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article/wildlife-watch-illegal-hummingbird-trade-love-charm-mexico-witchcraft/>。
- ¹¹ 请参阅 Alejandra Goyenechea 和 Rosa A. Indenbaum, 《打击从拉丁美洲向美国贩运野生动物: 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非法贸易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华盛顿特区: 野生动物保护者组织, 2015年10月13日), <https://defenders.org/combating-wildlife-trafficking>。
- ¹² 关于地方所有权和经济权利的重要性和作用以及这样做法的挑战, 见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
- ¹³ 背景信息请参阅 Juan Manuel Torres-Rojo, Rafael Moreno-Sánchez 和 Martín Alfonso Mendoza-Briseño, 《墨西哥可持续森林管理》, 《当前林业报告》, 第2期, (2016), 93-105页,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725-016-0033-0>。
- ¹⁴ 笔者对4位墨西哥生物学家和保护活动家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⁵ Vanda Felbab-Brown, 《墨西哥的非法捕鱼和政策应对措施》, 今日墨西哥, 2020年9月12日, <https://mexicotoday.com/2020/09/12/opinion-illegal-fishing-in-mexico-policy-responses/>。
- ¹⁶ 《墨西哥的非法和非正常捕捞: 对竞争的限制》, 环境保护基金会,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illegal_fishing.pdf。
- ¹⁷ Andrés M. Cisneros-Montemayor, Miguel A. Cisneros-Mata, Sarah Harper 和 Daniel Pauly, 《墨西哥海洋渔业中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的捕获量及其影响》, 《海洋政策》, 第13期, 2013年5月, 283-288页, <http://dx.doi.org/10.1016/j.marpol.2012.12.003>。
- ¹⁸ 笔者对15位墨西哥和国际海洋生物学家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 2021年10月和11月。
- ¹⁹ 请参阅 Suzanna Stephens 和 Matthew Southerland, 《中国在野生动物贩运中的作用和中国政府的对策》, (华盛顿特区: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2018年12月6日), <https://www.uscc.gov/research/chinas-role-wildlife-trafficking-and-chinese-governments-response>。
- ²⁰ 见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 和 Craig Simmons, 《贪得无厌的龙》。
- ²¹ 背景信息请参阅, 《越来越多的老虎养殖场参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世界自然基金会, https://tigers.panda.org/news_and_stories/stories/increasing_number_of_tiger_farms_implicated_in_illegal_wildlife_trade/。

- ²² 详细信息请参阅 Vivienne L. Williams, Andrew J. Loveridge, David J. Newton 和 David W. Macdonald, 《生意兴隆? 从非洲到东亚、东南亚的黑豹骨头合法贸易》, 《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 第 12 卷, 第 10 期, 2017 年 10 月 24 日,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85996>; Vivienne L. Williams 和 Michael J. ‘t SAS-Rolfes, 《天生圈养: 对南非狮子繁殖、饲养和狩猎行业的调查》, 《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 第 14 卷, 第 15 期, 2019 年 5 月 28 日,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7409>; 和 Morgan Winsor, 《南非将终止圈养狮子和骨头交易》, ABC 新闻, 2021 年 5 月 2 日,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south-africa-end-captive-lion-breeding-bone-trade/story?id=77451913>。
- ²³ 请参阅 Rachel Nuwer, 《在美洲豹被杀的地方, 出现了新的共同因素: 中国投资》, 纽约时报, 2020 年 6 月 11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1/science/jaguars-poaching-china.html>; Pauline Verheij, 《对玻利维亚和苏里南的野生动物偷猎和贩运的评估》, (阿姆斯特丹: 自然保护联盟荷兰国家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http://dx.doi.org/10.13140/RG.2.2.33323.59684>。
- ²⁴ 笔者对一位在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工作多年的墨西哥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 年 10 月。
- ²⁵ 同上。
- ²⁶ 同上。
- ²⁷ 笔者对墨西哥环境政府官员进行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0 月。
- ²⁸ Gwendolyn Ledger, 《中国, 拉美大型铁路项目的沉默指挥者》, WorldCrunch, 2021 年 10 月 11 日, <https://worldcrunch.com/business-finance/railway-construction/particle-6>。
- ²⁹ Victor Lichtinger 和 Homero Aridjis, 《玛雅列车悲剧》, 华盛顿邮报, 2018 年 12 月 4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12/04/amlo/>。
- ³⁰ María Verza, 《墨西哥总统全力推进玛雅列车的建设》, 美联社, 2020 年 6 月 3 日,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mexicos-president-full-steam-ahead-mayan-train-71036966>。
- ³¹ 详细信息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
- ³² Deborah Bonello 和 Parker Asmann, 《鳄鱼和海龟养殖场能减少墨西哥的生态贩运问题吗?》, InSight Crime, 2019 年 6 月 10 日, <https://insightcrime.org/investigations/crocodile-turtle-farms-reduce-mexico-eco-trafficking/>。
- ³³ 笔者对墨西哥政府前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 年 10 月。
- ³⁴ 同上。
- ³⁵ 在墨西哥被偷猎并走私到中国的各类蛤蜊中, 有一种是象拔蚌。有关偷猎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Antonio Heras, 《非法捕捞危及象拔蚌数量》, *La Jornada*, 2022 年 1 月 23 日, <https://www.jornada.com.mx/notas/2021/09/22/estados/pesca-ilegal-pone-en-peligros-especie-almeja-chiluda/>。
- ³⁶ Linda Pressly, 《“海上可卡因”威胁濒临灭绝的小头鼠海豚》, BBC 新闻, 2021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57070814>。
- ³⁷ 有关背景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拯救小头鼠海豚与今秋的迫切事项》; Vanda Felbab-Brown, 《消失的小头鼠海豚与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挑战》。
- ³⁸ 笔者对 2021 年 11 月进行小头鼠海豚调查的海洋生物学家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请参阅《2021 年秋季对小头鼠海豚的调查》, IUCN-SSC 鲸目动物专家组, 2021 年 12 月 16 日, <https://iucn-csg.org/vaquitas-seen-in-autumn-2021-survey/>。
- ³⁹ Kristin Nowell 和 Vanda Felbab-Brown, 《海豚使命: 拯救小头鼠海豚及美墨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 2021 年 7 月 26 日,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7/26/a-porpoise-to-serve-rescuing-the-vaquita-and-the-us-mexico-relationship/>。
- ⁴⁰ Caterina D'Agrosa, Cleridy E. Lennert Cody 和 Omar Vidal, 《死于墨西哥小型渔业刺网的小头鼠海豚: 将一个小种群推向灭绝》, 《保护生物学》, 第 14 卷, 第 4 期, 2000 年, 1110-1119 页, <https://doi.org/10.1046/j.1523-1739.2000.98191.x>。
- ⁴¹ Enrique Sanjurjo-Rivera, Sarah L. Mesnick, Sara Ávila-Forcada, Oriana Poindexter, Rebecca Lent, Vanda Felbab-Brown, Andrés M. Cisneros-Montemayor, Dale Squires, U. Rashid Sumaila, Gordon Munro, Rafael Ortiz-Rodriguez, Ramses Rodriguez 和 Jade F. Sainz, 《拯救小头鼠海豚政策的经济视角: 保护行动、野生动物贩运和激励机制的结构》, 《海洋科学前沿》, 2021 年 8 月 27 日,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1.644022>; Vanda Felbab-Brown 和 Alejandro Castillo López,

- 《恢复美墨海产品贸易，拯救小头鼠海豚》，今日墨西哥，2021年5月7日，<https://mexicotoday.com/2021/05/07/opinion-restore-us-mexico-seafood-trade-save-the-vaquita/>。
- ⁴² 笔者对海洋生物学家和保护活动家的采访，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另见 Camilo Mejía Giraldo 和 James Bargent，《墨西哥的毒枭是否正在进入利润丰厚的鱼鳔市场？》，InSight Crime，2014年8月6日，<https://insightcrime.org/news/brief/mexico-narcos-fish-bladder-market/>；Mimi Yagoub，《毒品鱼为墨西哥犯罪分子贩运轻松赚钱》，InSight Crime，2016年7月8日，<https://insightcrime.org/news/brief/narco-fish-trafficking-easy-money-for-mexico-criminals/>；《上钩了：对一种受保护鱼类的需求如何使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腰包鼓起来并使一种濒危鼠海豚物种的未来消失》，（华盛顿特区：C4ADS，2017年8月），<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6ef8b4d8af107232d5358a/t/59c011106f4ca3a44430588c/1505759529205/Hooked.pdf>。
- ⁴³ 笔者对墨西哥环境活动家、海洋生物学家和圣费利佩居民的采访，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 ⁴⁴ Enrique Sanjurjo-Rivera, Sarah L. Mesnick, Sara Ávila-Forcada, Oriana Poindexter, Rebecca Lent, Vanda Felbab-Brown, Andrés M. Cisneros-Montemayor, Dale Squires, U. Rashid Sumaila, Gordon Munro, Rafael Ortiz-Rodriguez, Ramses Rodriguez 和 Jade F. Sainz，《拯救小头鼠海豚政策的经济视角》。
- ⁴⁵ 请参看纪录片《阴影之海》，导演 Richard Ladkani（2019，国家地理纪录片电影公司），<https://films.nationalgeographic.com/sea-of-shadows>。
- ⁴⁶ 笔者对墨西哥政府前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2021年10月。
- ⁴⁷ 《香港海关查获超过3吨疑似被列管的鱼翅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1年5月29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29/P2021052900696.htm>；James Pasley，《香港海关官员查获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史上最多的28吨鱼翅》，商业内幕，2020年5月7日，<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hong-kong-seized-28-tons-shark-fin-largest-capture-ever-2020-5>；《海关人员在曼萨尼约查获10吨鱼翅》，2019年5月27日，墨西哥日报，<https://mexiconewsdaily.com/news/customs-agents-seizes-10-tonnes-of-shark-fins/>。
- ⁴⁸ 详情见 Leonor Flores，《国家税务总局在曼萨尼约海关查获10.4吨鱼翅》，*El Universal*，2019年5月26日，<https://www.eluniversal.com.mx/estados/sat-asegura-104-toneladas-de-aletas-de-tiburón-en-aduana-de-manzanillo>；和 Aimee Ortiz，《美国称贩运鲨鱼鳍的国际犯罪团伙已被捣毁》，*纽约时报*，2020年9月4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4/us/shark-fin-ring-georgia.html>。
- ⁴⁹ 笔者对两位墨西哥海洋生物学家和一名环境活动家的采访，虚拟平台，2022年2月。
- ⁵⁰ 同上。
- ⁵¹ Abigail Bennett 和 Xavier Basurto，《当地机构对全球市场压力的反应：墨西哥尤卡坦的海参贸易》，《世界发展》，第102期，2018年2月，57-70页，<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7.09.006>；及 Meredith Gore 和 Abigail Bennett，《深化犯罪和保护科学一体化的重要性》，《保护生物学》，第36卷，第1期，2022年2月，981-989页，<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600003/>。
- ⁵² Miguel Ángel Gamboa-Álvarez, Jorge Alberto López-Rocha, Gaspar Román Poot-López, Alfonso Aguilar-Perera 和 Harold Villegas-Hernández，《墨西哥坎佩切大浅滩海参渔业的兴衰》，《海洋和海岸管理》，第184期，2020年2月1日，<https://doi.org/10.1016/j.ocecoaman.2019.105011>。关于墨西哥执法措施，包括陆地和海上缉获的详细情况，见 Teale N. Phelps Bondaroff, Felix Morrow, Abigail Bennett, Carmen Pedroza-Gutiérrez, Meredith L. Gore 和 Jorge A. López-Rocha，《利用媒体报道描述墨西哥海参犯罪十年来的变化（2011-2021）》，太平洋共同体海参信息公告牌，第42期，2022年春，即将出版，笔者获得的提前版。
- ⁵³ Karla Zabudovsky，《追求海底的非法收益导致渔业社区分裂》，*纽约时报*，2013年3月19日，<https://www.nytimes.com/2013/03/20/world/americas/quest-for-illegal-gain-at-the-sea-bottom-divides-fishing-communities.html>。
- ⁵⁴ Víctor Hugo Michel，《坎佩切和尤卡坦：最严重的海参危机》，*Milenio*，2014年9月17日，<https://www.milenio.com/estados/campeche-y-yucatan-la-peor-crisis-por-el-pepino-de-mar>。
- ⁵⁵ Karla Zabudovsky，《追求海底的非法收益导致渔业社区分裂》。
- ⁵⁶ 《一个“海参黑手党”在尤卡提卡海岸活动》，尤卡坦时报，2018年3月8日，<https://www.theyucantimes.com/2018/03/a-sea-cucumber-mafia-operates-along-the-yucatecan-coast/>。

⁵⁷ 请参阅 Luis E. Calderon—Aguilera, 《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 非法捕捞海参的现象十分猖獗》, 太平洋共同体海参信息公告牌, 第 39 期, 2019 年 3 月, 42-46 页,

https://www.spc.int/DigitalLibrary/Doc/FAME/InfoBull/BDM/39/BDM39_49_Calderon.html。

⁵⁸ 笔者对墨西哥政府官员、海洋生物学家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和南下加利福尼亚州,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⁵⁹ 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

⁶⁰ 笔者对墨西哥政府官员、海洋生物学家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和南下加利福尼亚州,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⁶¹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联合会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⁶² 笔者对一家墨西哥大型海鲜出口商高管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⁶³ 同上。

⁶⁴ 笔者对合法和非法渔民、海鲜生产者和出口商、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⁶⁵ 笔者对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海鲜生产商和一位渔民联合会的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⁶⁶ 同上。

⁶⁷ 笔者对海鲜生产者、墨西哥渔民联合会代表以及合法和非法小型渔业渔民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⁶⁸ 笔者对墨西哥的一位海鲜出口商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⁶⁹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联合会代表和墨西哥海鲜供应商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⁷⁰ 笔者对墨西哥的一位海鲜出口商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⁷¹ 笔者对渔民、海洋生物学家、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海鲜出口商的采访, 墨西哥各地和虚拟平台, 2021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

⁷² 笔者对圣费利佩的渔民、海洋生物学家、环保活动家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及虚拟平台, 2021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

⁷³ 笔者对一家墨西哥大型海鲜出口商高管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⁷⁴ 笔者对一家墨西哥大型海鲜出口公司高管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⁷⁵ 同上。

⁷⁶ 笔者对一位墨西哥海鲜加工厂厂主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⁷⁷ 同上。

⁷⁸ 同上。

⁷⁹ 笔者对合法和非法渔民、海鲜生产者和出口商、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⁸⁰ 笔者对一位前墨西哥政府情报官员和一位海鲜出口商的采访, 墨西哥及虚拟平台, 2021 年 11 月。

⁸¹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前任和现任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⁸² 笔者对墨西哥的一位海鲜出口商和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⁸³ 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墨西哥贩毒集团和新冠大流行》, 今日墨西哥, 2020 年 4 月 24 日,

<https://mexicotoday.com/2020/04/24/opinion-mexican-cartels-and-the-covid-19-pandemic/>。

⁸⁴ 笔者对墨西哥的一位海鲜出口商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⁸⁵ 同上。

⁸⁶ 笔者对合法和非法渔民、海鲜生产者和出口商、渔业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以及虚拟平台,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⁸⁷ 笔者对墨西哥渔业合作社和联合会的渔民和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⁸⁸ 笔者对合法和非法渔民、海鲜生产者和出口商、渔业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关于墨西哥政府不愿意授权公开使用致命武力问题, 见 Vanda Felbab-Brown, 《2022 年墨西哥的犯罪与反犯罪政策》。

⁸⁹ 同上。

⁹⁰ 笔者对墨西哥一位海鲜加工厂主管的采访, 墨西哥, 2021 年 11 月。

⁹¹ “2021 年地区统计: 联邦选举”, 国家选举研究所, <https://computos2021.ine.mx/votos-ppyci/representacion-proporcional>。

- ⁹² 笔者对墨西哥渔业代表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以及对墨西哥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活动家的采访，虚拟平台，2022年2月。
- ⁹³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联合会一名位高级官员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⁹⁴ Vanda Felbab-Brown, 《墨西哥民兵的崛起》。
- ⁹⁵ 笔者对七位非法和合法的个体渔民以及墨西哥渔民联合会前高级官员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⁹⁶ Elías Medina, 《税制改革惹恼生产者，让他们付更多的税》，El Sudcaliforniano, 2021年10月28日, <https://www.elsudcaliforniano.com.mx/local/molesta-a-productores-pagar-mas-impuestos-por-la-reforma-fiscal-7401783.html>。
- ⁹⁷ 笔者对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虚拟平台和墨西哥城；对墨西哥渔民组织前高级官员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0月和11月。
- ⁹⁸ 笔者对墨西哥四位前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对五位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的采访，墨西哥城、莫雷利亚、拉巴斯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另见 Drazen Jorgic, 《特别报告：一次性手机和银行 App：认识为墨西哥毒品资金洗钱的中国中间商》，路透社，2020年12月3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exico-china-cartels-specialreport/special-report-burner-phones-and-banking-apps-meet-the-chinese-brokers-laundering-mexican-drug-money-idUSKBN28D1M4>。
- ⁹⁹ 笔者对合法和非法渔民、海鲜生产者和出口商、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的代表、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 ¹⁰⁰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联合会及非法和合法渔民代表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¹⁰¹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高级官员、墨西哥海鲜出口商、墨西哥环境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 ¹⁰² 同上。
- ¹⁰³ 请参阅如 ndrea Crosta, Kimberly Sutherland, Chiara Talerico, Isabelle Layolle 和 Beatrice Fantacci, 《假金行动：石首鱼供应链（从墨西哥的石首鱼贩毒集团到中国的石首鱼鳔批发商）：扼杀了小头鼠海豚的非法贸易》，（洛杉矶：大象行动联盟，2018年7月），<https://earthleagueinternational.org/operation-fake-gold/>；Eduardo Murillo, 《坎昆机场查获 27 块石首鱼鱼鳔》，La jornada, 2020年7月12日, <https://www.jornada.com.mx/ultimas/estados/2020/07/12/decomisan-27-buches-de-totoaba-en-aeropuerto-de-cancun-1387.html>；和《联邦警察在圣路易斯波托西机场查获的海马和石首鱼鱼鳔》，La Brecha, 2016年5月18日, <https://labrecha.me/municipalidades/ciudad/caballitos-de-mar-y-buche-de-totoaba-decomiso-la-pf-en-el-aeropuerto-de-slp/>。
- ¹⁰⁴ 笔者对一位墨西哥大型海鲜出口商高管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¹⁰⁵ 笔者对圣克拉拉的环境活动家以及渔民联合会高级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其它地方，2021年10月和11月。另见 María Esther Cruz-Colín, Miguel Ángel Cisneros-Mata, Gabriela Montão-Moctezuma, Ileana Espejel, Andrés Miguel Cisneros-Montemayor 和 Luis Malpica-Cruz, 《浅析加利福尼亚湾沙海蜚渔业的复杂系统》，《海洋与海岸管理》，第 207 期，2021年6月15日，编号 105610, <https://doi.org/10.1016/j.ocecoaman.2021.105610>。
- ¹⁰⁶ 笔者对一位渔民联合会高级官员代表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¹⁰⁷ 同上。
- ¹⁰⁸ Drazen Jorgic, 《特别报告：一次性手机和银行 App》。
- ¹⁰⁹ 笔者对墨西哥 3 位海鲜出口商和渔民联合会官员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¹¹⁰ 笔者对 3 位海洋生物学家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有关墨西哥鲍鱼合法捕捞、偷猎和水产养殖的背景，请参阅 Ricardo Searcy-Bernal, Mario R. Ramade-Villanueva 和 Benito Altamira, 《墨西哥鲍鱼捕捞和养殖的现状》，《贝类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3 期，2010, 573-576 页, <https://doi.org/10.2983/035.029.0304>；和 Ricardo Bórquez Reyes, Oscar Alberto Pombo 和 Germán Ponce Díaz,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一项研究：渔民偷捕鲍鱼（Haliotidae）的原因》，《北美渔业管理杂志》，第 29 卷，第 1 期，2009, 237-244 页, <https://doi.org/10.1577/M06-032.1>。
- ¹¹¹ 笔者对墨西哥贩毒问题专家的采访，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
- ¹¹² 笔者对墨西哥渔民合作社和联合会现任和前任官员的采访，墨西哥，2021年11月。

- ¹¹³ Karen Yeung, 《加密货币帮助中国规避资本和货币管制, 将数十亿美元转移到海外》, 南华早报, 2020年8月26日,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98981/cryptocurrencies-help-chinese-evade-capital-and-currency>。
- ¹¹⁴ Drazen Jorgic, 《特别报告: 一次性手机和银行应用程序》。
- ¹¹⁵ 请参见如《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的洗钱风险》, 七国集团, 2021年12月21日, <https://www.g7uk.org/g7-interior-and-security-ministers-senior-officials-meeting-crimes-that-affect-the-environment/>。
- ¹¹⁶ 笔者对美国政府官员、墨西哥环境活动家和墨西哥海鲜生产商的采访, 墨西哥各地, 2021年10月和11月。
- ¹¹⁷ 笔者对一位前墨西哥政府官员、多位美国政府官员、墨西哥环境活动家和墨西哥海鲜生产商的采访, 墨西哥各地, 2021年10月和11月。
- ¹¹⁸ Aimee Ortiz, 《美国称贩运鲨鱼鳍的国际犯罪团伙已被捣毁》。
- ¹¹⁹ 笔者对现任和前任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以及执法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 2021年10月和11月。
- ¹²⁰ Peter Gastrow, 《南非的三合会和中国有组织犯罪》, (比勒陀利亚: 安全问题研究所, 2001年), <https://media.africaportal.org/documents/paper48.pdf>; Jonny Steinberg, 《南非的非法鲍鱼贸易》, (比勒陀利亚: 安全问题研究, 2005年4月), <https://www.files.ethz.ch/isn/99200/105.pdf>; Kimon de Greef 和 Serge Raemaekers, 《南非的非法鲍鱼贸易: 最新概述和知识差距分析》(英国剑桥: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2014年), <https://www.traffic.org/site/assets/files/8469/south-africas-illicit-abalone.pdf>; 和 Wilson Lau, 《对南非鲍鱼干 (*Haliotis midae*) 在香港的消费和贸易的评估》, (英国剑桥: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2018年2月), <https://www.traffic.org/site/assets/files/2235/traffic-hk-abalone-report.pdf>; 以及 Kimon de Greef 和 Simone Haysom, 《中断鲍鱼贸易的危害: 鲍鱼干从南非到东亚的非法流动》, (日内瓦: 全球打击有组织犯罪倡议, 2022年2月), <https://globalinitiative.net/analysis/abalone-south-africa-east-asia/>。
- ¹²¹ 笔者对美国和国际执法官员及毒品政策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1月。
- ¹²²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²³ 同上。
- ¹²⁴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²⁵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²⁶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²⁷ 同上。
- ¹²⁸ 《中国查获价值2600万美元的石首鱼鱼鳔, 逮捕16人》, Mongabay, 2018年12月29日, <https://news.mongabay.com/2018/12/china-seizes-totoaba-swim-bladders-worth-26-million-arrests-16/>。
- ¹²⁹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关于早期在美国、墨西哥和香港的缉获情况, 见《双重灭绝: 对濒临灭绝石首鱼的非法贸易及其对极度濒危小头鼠海豚的影响》, (伦敦: 环境调查机构, 2016年1月),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EIA-Dual-Extinction.pdf>。
- ¹³⁰ 笔者对调查环境活动家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0月。
- ¹³¹ 见 Abdulrahman Ben-Hasan, Yvonne Sadovy de Mitcheson, Miguel A. Cisneros-Mata, Érica Antes Jimenez, Moslem Daliri, Andrés M. Cisneros-Montemayor, Rekha J. Nair, Sangeetha A. Thankappan, Carl J. Walters 和 Villy Christensen, 《中国的鱼鳔需求及其对来源国渔业的影响》, 《海洋政策》, 第132期, 2021年10月, 编号104696,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21.104696>; 《132: 控制和监测黄花鱼的鱼鳔贸易, 以保护目标黄花鱼并减少受威胁的海洋巨型动物被误捕》, 马赛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2021年10月3日,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motion/132>; Lulu Ning Hui 和 Sarita Reed, 《“海上黄金”: 巴西蓬勃发展的鱼鳔贸易》, 半岛电视台, 2022年1月20日,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2/1/20/gold-in-the-sea-brazils-booming-fish-bladder-trade>。
- ¹³² Clifford Lo, 《香港海关查获近20年来最大一批鱼鳔, 价值2500万港元, 5人被捕》, 南华早报, 2020年6月8日,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88021/five-arrested-and-fish-bladders-worth-hk25-million>。
- ¹³³ Clifford Lo, 《香港海关查获价值330万港元的濒危石首鱼鱼鳔》, 南华早报, 2021年7月27日,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42717/hong-kong-customs-seizes-hk33-million-worth-fish>。

- ¹³⁴ Vanda Felbab-Brown, 《灭绝市场》。
- ¹³⁵ 有关美国以前针对石首鱼偷猎的阻截行动, 请参见《腥臭的生意: 鱼鳔走私者在联邦法院被判刑》, 美国司法部, 2014年8月11日, <https://www.justice.gov/usao-sdca/pr/fishy-business-smuggler-swim-bladders-sentenced-federal-court>; 和 Aimee Ortiz, 《美国称贩运鲨鱼鳍的国际犯罪团伙已被捣毁》。有关一些中国石首鱼走私网络的结构, 请参阅 C4ADS, 《上钩了: 对一种受保护鱼类的需求如何使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腰包鼓起来并使一种濒危鼠海豚物种的未来消失》。
- ¹³⁶ 《中国环境破坏情况说明》,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 2020年9月25日, <https://br.usembassy.gov/chinas-environmental-abuses-fact-sheet/>。
- ¹³⁷ 同上。
- ¹³⁸ 《美国环境破坏情况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0年10月19日,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b_663304/zjzg_663340/tyfls_665260/tfsxw_665262/202010/t20201019_599997.html。
- ¹³⁹ 同上。
- ¹⁴⁰ 高乔, 《保护野生动物, 中国言行一致》, 人民日报, 2020年12月10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10/c_1210924693.htm。
- ¹⁴¹ 同上。
- ¹⁴² Yang Wanli, 《国家公园加强“美丽中国”计划》, 中国日报, 2020年9月28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09/28/WS5f713785a31024ad0ba7c3a5.html>。
- ¹⁴³ 常纪文, 《应对野生动物走私法治问题的中国策略》, 中国环境报, 2020年2月10日, http://www.cfej.net/jizhe/cmlw/202002/t20200211_762606.shtml。
- ¹⁴⁴ 李洪洋, 《各国可以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工作中学习》, 中国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10/18/WS616ccb6da310cdd39bc6f788.html>。
- ¹⁴⁵ 笔者对前任墨西哥官员、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环境犯罪调查人员的采访, 2021年10月、11月和12月。
- ¹⁴⁶ Drazen Jorgic, 《特别报告: 一次性手机和银行 App》。
- ¹⁴⁷ 《2020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华盛顿特区: 美国司法部美国缉毒局, 2021年3月), https://www.d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2/DIR-008-21%202020%20National%20Drug%20Threat%20Assessment_WEB.pdf。
- ¹⁴⁸ 笔者对美国执法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2月。
- ¹⁴⁹ 笔者对3位现任和前任国际和美国官员及执法官员以及3位现任国际药物政策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1月和12月。
- ¹⁵⁰ 笔者对一位前国际执法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1月。
- ¹⁵¹ 笔者对中国的环境犯罪问题专家和东南亚多边反犯罪机构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1月和12月。
- ¹⁵²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美国官员以及调查东南亚和非洲野生动物犯罪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 2021年10月、11月和12月。
- ¹⁵³ 笔者对一位前国际执法官员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2月。
- ¹⁵⁴ 请参阅, 《中国公民从墨西哥走私价值370万美元的石首鱼鱼鳔后在美国被捕》, Mongabay, 2019年6月21日,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06/chinese-nationals-arrested-in-us-after-smuggling-totoaba-swim-bladders-worth-3-7-million-from-mexico/>。
- ¹⁵⁵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 ¹⁵⁶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另请参阅《CITES的最后机会: 停止非法石首鱼贸易, 拯救小头鼠海豚》, (伦敦: 环境调查局, 动物福利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2019年8月),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EIA-report-citess-last-chance-single-pages-for-print.pdf>。
- ¹⁵⁷ 笔者对墨西哥前外交官和墨西哥环境活动家的采访, 墨西哥城和南下加利福尼亚州, 2021年10月和11月。
- ¹⁵⁸ Ernesto Méndez, 《地球海洋养殖场获准出口人工养殖的石首鱼鱼肉》, 至上报, 2022年3月10日, <https://www.excelsior.com.mx/nacional/aprueban-exportacion-carne-totoaba-criada-en-cautiverio/1503230>。
- ¹⁵⁹ 笔者对位于中国的野生动物贩运问题专家的采访, 虚拟平台, 2021年12月。
- ¹⁶⁰ 笔者对墨西哥政府前官员的采访, 墨西哥城, 2021年10月。

¹⁶¹ 笔者对美国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的采访，虚拟平台，2021年11月和12月。

¹⁶² 同上。

¹⁶³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2021年10月。

¹⁶⁴ 请参阅 Pauline Repard, 《圣地亚哥进口商因走私海参被罚款 100 万美元》，圣地亚哥联合报，2018年10月2日，<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courts/sd-me-cucumber-sentenced-20181002-story.html>；《海参走私犯被判处八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2020年6月9日，<https://www.justice.gov/usao-sdca/pr/sea-cucumber-smuggler-sentenced-eight-months-jail>；《丘拉维斯塔居民因非法进口 300 万美元鲍鱼而获罪》，美国司法部，2017年8月30日，<https://www.justice.gov/usao-sdca/pr/chula-vista-resident-guilty-illegal-importation-3-million-abalone>。

¹⁶⁵ 笔者对墨西哥和国际海洋生物学家、环境活动家和海鲜生产商的采访，墨西哥各地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¹⁶⁶ 笔者对现任和前任墨西哥政府专门处理野生动物犯罪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官员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墨西哥其它地区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¹⁶⁷ Enrique Provencio 和 Julia Carabias, 《联邦环境预算：不合理和不相称的待遇》，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跨学科中心，2019年4月18日，<https://ceiba.org.mx/jcl-y-epd-injustificado-presupuesto-federal-medio-ambiente>。

¹⁶⁸ 请参阅 Emilio Godoy, 《墨西哥放弃了其环境领导地位》，Diálogo Chino, 2021年1月15日，<https://dialogochino.net/en/climate-energy/39215-mexico-eschews-its-environmental-leadership/>；Max de Haldevang, 《墨西哥非政府组织抨击总统洛佩斯关闭气候研究中心的计划》，彭博绿色（Bloomberg Green），2021年12月16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2-16/mexican-ngos-blast-amlo-s-plan-to-mothball-climate-institute>。

¹⁶⁹ Paulo Quadri Barba, 《墨西哥抛弃保护区》，天空岛联盟（Sky Island Alliance），2020年6月5日，<https://skyislandalliance.org/2020/06/mexico-abandons-its-protected-areas/>。

¹⁷⁰ 同上。

¹⁷¹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安全专家和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另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2022年墨西哥的犯罪和反犯罪政策：前景黯淡》；Vanda Felbab-Brown, 《厚颜无耻的罪犯》，今日墨西哥，2020年7月31日，<https://mexicotoday.com/2020/07/31/opinion-criminal-brazeness-matters/>。

¹⁷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反洗钱行动的安全政策：创新的想法，艰难的现实》（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3月），<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mlos-security-policy-creative-ideas-tough-reality/>。

¹⁷³ 笔者对前墨西哥执法和情报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各地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另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 《2022年墨西哥的犯罪和反犯罪政策：前景黯淡》。

¹⁷⁴ Kristin Nowell 和 Vanda Felbab-Brown, 《海豚使命》。

¹⁷⁵ 有关海洋守护者协会的详细信息，请观看《阴影之海》，国家地理纪录片电影公司。有关鲸鱼与海洋科学博物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rnesto Méndez, 《鲸鱼博物馆的船回到禁捕小头鼠海豚区》，至上报，2021年8月6日，<https://www.excelsior.com.mx/nacional/barco-del-museo-de-la-ballena-regresa-a-zona-de-tolerancia-cero-de-vaquita-marina/1464572>。关于墨西哥政府暂停“海洋守护者协会”和“鲸鱼与海洋科学博物馆”移除刺网的详细情况，见 Kristin Nowell 和 Vanda Felbab-Brown, 《海豚使命：拯救小头鼠海豚与美墨关系》。

¹⁷⁶ 笔者对墨西哥和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墨西哥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11月以及2022年1月；Ernesto Méndez, 《非政府组织被禁声、禁止活动，无法拯救小头鼠海豚》，至上报，2021年12月15日，<https://www.excelsior.com.mx/nacional/ong-maniatadas-salvar-vaquita-marina-alto-golfo-california/1488092>。

¹⁷⁷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调查特别检察署（SEIDO）打击海上贩毒集团》，蒂华纳塔杂志，2020年11月16日，<https://zetatijuana.com/2020/11/sacude-seido-al-cartel-del-mar/>。

¹⁷⁸ 笔者对墨西哥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虚拟平台，2022年1月和2月。

¹⁷⁹ 笔者对现任和前任墨西哥政府专门处理野生动物犯罪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官员、墨西哥环保人士和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墨西哥其它地区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¹⁸⁰ 笔者对现任和前任墨西哥政府专门处理野生动物犯罪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官员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墨西哥其它地区和虚拟平台，2021年10月和11月。

¹⁸¹ 同上。

¹⁸² 笔者对墨西哥前政府官员的采访，墨西哥城，2021年10月。

¹⁸³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灭绝市场》，198页。

¹⁸⁴ Enrique Sanjurjo-Rivera, Sarah L. Mesnick, Sara Ávila-Forcada, Oriana Poindexter, Rebecca Lent, Vanda Felbab-Brown, Andrés M. Cisneros-Montemayor, Dale Squires, U. Rashid Sumaila, Gordon Munro, Rafael Ortiz-Rodriguez, Ramses Rodriguez 和 Jade F. Sainz,《拯救小头鼠海豚政策的经济视角：保护行动、野生动物贩运和激励机制的结构》。

¹⁸⁵ Rosie Cooney, Paola Mosig Reidl 和 Luis Guillermo Muñoz Lacy,《墨西哥社区的大角羊战利品狩猎活动》，（日内瓦：CITES, 2019年），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prog/Livelihoods/case_studies/6.%20Mexico_bighornsheep_long_Aug2.pdf。

¹⁸⁶ 关于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其它生物多样性定价计划的例子、设计以及挑战，请参阅 Ina Porras 和 Paul Steele,《让市场为自然服务：生物积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减少贫困》，（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2020年3月），<https://pubs.iied.org/sites/default/files/pdfs/migrate/16664IIED.pdf>。

¹⁸⁷ 关于反洗钱措施的局限性及其使野生动物贩运集团破产的能力，请参阅 Vanda Felbab-Brown,《灭绝市场》，205-218页。